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第 64 期
2020 年 12 月，頁 129-186
DOI: 10.6243/BHR.202012_(64).0004

歷史懷疑論、古物研究與近代歐洲史學的起源*

楊肅献**

摘要

這篇論文目的是探討近代歐洲歷史學界書寫「可信的」「古代史」的學術基礎，由此討論近代歐洲史學方法的起源問題。從古典時代到文藝復興時期，歐洲歷史家發展出一種以史家的見證為基礎，以當代史為主要對象的歷史書寫傳統。但到十六世紀時，這種以「敘事性史源」為基礎的人文主義史學，其可靠性開始受到歷史懷疑論的質疑而陷入一種「歷史意識的危機」。此一史學危機中，因古物學的發展而得以化解。古物學是文藝復興古典學術的一支，試圖以古代文物的收集與考究來重建古代世界，其特色是重視具體可見的文物，如錢幣、銘文、圖像、紀念建築、檔案文獻等。這些具體的文物，因係古人遺留的一手證據，被認為是比敘事性史源更可靠的歷史資料，可據以書寫「可信的」古代史。古物學的興起引起一個史學方法的革命，不但化解人文主義史學的危機，也帶動歐洲歷史家的書寫轉向，從當代史的寫作導向古代史的書寫。

關鍵詞：古典史學、人文主義史學、歷史懷疑論、古物研究

---

* 這篇論文是本人 2019 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MOST 108-2410-H-002-045）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僅此致謝。同時，也要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仔細閱讀本文，並提供諸多珍貴的修正建議。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一、導言

「史學的任務為何？」我們如果去問一個史學工作者，他的回答極可能會是：歷史家的職責是探索「過去」發生之事，並將探索結果寫成「真實的歷史」。這聽起來是史學的老生常談，認真檢討起來可以是一個複雜的課題。

歷史研究與書寫的對象是「過去」，這毫無疑問。但是「過去」是個籠統的概念，從字義看凡是「此刻」之前發生的事都屬於「過去」，理論上都是歷史家研究與書寫的範圍。不過，「過去」又可分為「最近的過去」與「遙遠的過去」，而現代歷史家似乎有一種不成文的行規，大都傾向探討比較「遙遠的過去」，卻對是否適合書寫「最近的過去」常持著保留態度。我們只需瀏覽一下史學的出版狀況，即可發現「現代史」或「當代史」的研究，遠不及近代以前歷史的研究。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主要可能基於兩種顧慮：一方面，現代史學強調「檔案」史料的重要性，但檔案的解密與公開通常都是在事件發生數十年後，史家因不易掌握一手史料，覺得難以進行原創性研究。另一方面，歷史研究更重視「客觀性」，強調史家與研究對象須維持一定距離，才易公正客觀。歷史家與當代史距離太近，無法保持足夠的歷史「距離感」，難以期待能寫出客觀、可靠的歷史。[1]

然而，檢視歐洲史學發展史，我們可發現以「遙遠的過去」作主要對象的歷史書寫觀念是近代的產物。在十八世紀以前，歐洲史家寫的正規史書大都侷限於現代或當代史，至多及於近代史；至於遙遠古代的書寫，在他們看來是不可能的或不必要的工作。十八世紀以前的史家與現代史家，對歷史書寫的對象，看法何以出現如此的差異？檢討起來，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和兩者對

[1] 十九世紀以來法國史家的法國大革命史書寫是著名實例。有關法國史家與法國大革命的心理距離，可參考Francois Furet 於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書中的討論。參見Francois Furet,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4.

如何才能書寫「可信的歷史」的認知有關。

現代歷史家談論近代史學精神，最喜歡引用十九世紀德國歷史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的名言「歷史敘述，如其實在」（*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主張史家的職責是探索「什麼事情真正發生了」，並據之書寫「真實的歷史」。事實上，古今中外的歷史家都將「客觀精神」視為史學核心價值，古羅馬學者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43B.C.）即說：

> 有誰不知道，撰寫歷史的第一條法則就是，除了事實真相，作者不能講其他任何事情？它的第二條法則不就是，作者必須大膽地講述整個事實真相嗎？他的作品一定不能有任何偏見，對嗎？[2]

在西塞羅看來，追求事實真相乃是每個史家均熟悉的基本法則。問題是：史家要如何獲取事實真相，以憑書寫不帶任何偏見的歷史？

史家如何取得事實真相？史學本質上是一門實證的學科，而歷史書寫須建立在堅實可靠的「證據」（evidence）上，這是史學的基本認知。換言之，史家若要寫出可信的歷史，關鍵在於能否掌握可靠的證據。但是，什麼是可靠的證據？對於這問題，古今歷史家的理解有極大的差異。

現代史學工作的基本流程是：廣泛蒐集史料，從史料中耙梳證據，再根據證據形成敘述。歷史書寫須以證據為基礎，而證據則保存在史料中；由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遂為史家基本工夫。史料是事件發生後留下的遺跡，形式多元：有一手的與二手的，有口傳的與文獻的，也有文本的與文物的。在多元的史料中，什麼史料可靠、有價值？現代史家治史重視一手史料，尤其看重檔案的價值，形成牢不可破的行規；古代史家

---

2 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著，〈論演說家〉（“De oratore”），收入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著，王曉朝譯，《西塞羅全集（卷一）：修辭學》（臺北：左岸出版社，2005），頁391。

的治史習慣相當不同，他們不易接觸檔案文獻，很少利用一手史料，並不視為治史之要件。[3]希羅多德（Herodotus, 484-c.430/420B.C.）和修西底德（Thucydides, c. 460/455-c. 399B.C.）開創了歐洲的古典史學，其歷史書寫主要不是根據「文字檔案」（written documents），而是「口傳資料」（oral traditions），即史家在事件發生當下的「見證」（eye-witness）。[4]對古典史學來說，史家的個人見證是最可靠的證據與書寫的依據。這類以史家的見證形成的「口傳資料」，現代史家一般稱為「敘事性史源」（narrative sources），與檔案資料有別。[5]

以「口傳資料」為主要依據的觀念，影響到歷史書寫的方向：史家只可能寫作「當代」的信史。實際上，希羅多德和修西底德主要都是書寫親身經歷、見證過的當代史。[6]從古典時代到近代早期，歐洲史家的主流書寫也一直偏向「近／現代史」，很少嘗試重寫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 1521-1626）所說的「古代」的「完整歷史」（perfect history）（請參後文詳說）。要到十八世紀，歐洲的歷史寫作觀念才有新突破。此一轉變的關鍵在於古物研究興起帶來的「證據」觀念改變。1776 年，英格蘭史家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出版《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第一卷是重要標誌。吉朋似乎是近代史家中，少數具有慧識看出古物資料的證據價值，而能突破人文主義史家的當代史的寫作慣例，去書寫史學上具原

---

3 M. I. Finley,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by Thucydides, trans. Rex Warner (New York: Penguin Group, 1972), pp. 19-20.

4 Arnaldo Momigliano, “Historiography on Written Tradition and Historiography on Oral Tradition,” in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pp. 212-216.

5 Felix Gilbert,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 Century Florenc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4), p. 222; Denys Hay, “Flavio Biondo and the Middle Ages,” in *Renaissance Essays* (London: The Hambledon Press, 1988), p. 49.

6 Arnaldo Momigliano, “Historiography on Written Tradition and Historiography on Oral Tradition,” p. 214.

創價值的「古代完整歷史」。[7]

吉朋以一個十八世紀史家而能夠書寫一部富原創意義的羅馬帝國史，這在歐洲近代史學的發展上有重要意義。他的羅馬史書寫背後蘊含一個史學觀念與方法的轉向。這一個轉向是什麼？本文目的即是要探討近代歐洲歷史學界書寫「可信」的「古代史」的學術基礎，由此檢視近代歐洲史學方法的起源問題。

筆者對這個問題的興趣主是要受到義大利史家莫米格利亞諾（Arnaldo Momiglino, 1908-1987）的啟發。1950 年，莫米格利亞諾發表一篇經典性的〈論古代史與古物學者〉（“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討論近代早期歐洲古物學對近代史學方法發展的意義。[8]他在文中寫道：「古物學者的時代不僅意味一種品味的革命，也意味一個史學方法的革命。」又說：「在形成新史學方法的過程中 —— 因而在建立近代史學對古代世界的寫作上 —— 所謂的古物學者扮演顯著角色，並提出根本的問題。」[9]近代早期歐洲的古物研究何以竟造成近代史學方法上的革命？這是個值得注意的課題。

莫米格利亞諾之後對此一課題陸續有所討論，提出不少富啟發性的觀點，可惜對整個問題的來龍去脈不曾有完整的建構。[10]不過，他提出的問題引發不少歷史學者的興趣。1960 年代以來，歐

---

7 此處，「古代史」主要是指「古典歷史」，亦即「希臘、羅馬史」。

8 Arnaldo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13: 3/4 (1950), pp. 285-315. 這篇論文後收入 Arnaldo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in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pp. 1-39.

9 Arnaldo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p. 2.

10 Arnaldo Momigliano 有關此一課題的討論包括：“Gibbon’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Method” (原發表於1954); “Historiography on Written Tradition and Historiography on Oral Tradition” (原發表於1961);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參見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Arnaldo Momigliano, “Gibbon’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Method,” in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pp. 40-55; Arnaldo Momigliano, “Historiography on Written Tradition and Historiography on Oral Tradition,” pp. 211-220.

美史學界對莫米格利亞諾觸及的相關課題，繼有探討，也出版不少論著，協助理清不少問題或概念。首先，文藝復興史專家吉爾伯特（Felix Gilbert）和布萊克（Robert Black）有關文藝復興史學的論著，釐清了歐洲人文主義歷史書寫的起源與特色。[11]其次，1960年哲學史家波普金（Richard H. Popkin）首出書討論哲學懷疑論的起源與思想，是認識歷史懷疑論的基礎。[12]之後，歷史家富蘭克林（Julian Franklin）探討十六世紀歷史懷疑論對人文主義史學攻擊，[13]格拉夫頓（Anthony H. Grafton）則透過古物學者哈杜因（Jean Hardouin, 1646-1729）研究討論十八世紀初的激進懷疑論思想。[14]其三，柏克（Peter Burke）和馬丁辛（Anton Matytsin）進而探討，在歷史懷疑論的衝擊下十七世紀人文主義史學的危機，及歷史家的種種回應。[15]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有關近代早期歐洲古物學的研究，包括馬佐科（Angelo Mazzocco）、柏克和米勒（Peter N. Miller）等人，揭示了近代早期古物研究的內涵與史學價值。[16]

---

[11] Felix Gilbert,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 Century Florence*; Robert Black, "Benedetto Accolti and the Beginnings of Humanist Historiography,"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96: 378 (January, 1981), pp. 36-58.

[12] Richard H. Popkin, *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From Savonarola to Bayle*,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3] Julian H. Franklin, *Jean Bodin and the Sixteenth-Century Revolution in the Methodology of Law and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14] Anthony Grafton, "Jean Hardouin: The Antiquary as Pariah,"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62 (1999) , pp. 241-267.

[15] Peter Burke, "Two Crises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33 (1998), pp. 3-16; Anton Matytsin, "Historical Pyrrhonism and Historical Certainty in the Early Enlightenment," in *Pour et contre le scepitcisme: Théories et Pratiques de l'Antiquité aux Lumières*, ed. Elodie Argaud, Nawalle El Yadari, Séabastien Charles, and Gianni Paganini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15), pp. 243-259.

[16] Angelo Mazzocco, "A Reconsideration of Renaissance Antiquarianism in light of Biondo Flavio's 'Ars Antiquaria' with an Unpublished Letter from Paul Oskar Kristeller (1905-1999),"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vol. 59/60 (2014/2015), pp. 121-159; Peter Burke, "Images as Evid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4: 2 (April, 2003), pp. 273-296; Peter N. Miller, *Peiresc's Europe. Learning and Virtu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整體看來，史學界對「莫米格利亞諾問題」相關課題的探討，成果相當豐富。然而，這些研究都只是針對「莫米格利亞諾問題」個別層面的分析，而未見有全面性的梳理。這一篇論文的目的是試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近世歐洲「古物研究」到「近代史學方法革命」的發展歷程，做一個比較完整的討論，以重建近代歐洲史學革新與古典學術之間的關聯。這是歷史學界首次對此一課題作完整的疏理，也是本文的主要貢獻。

二、近世歐洲人文主義史學傳統的形成

（一）「見證」、「真實的歷史」與「當代史」

西元前六到五世紀間，古典希臘發生一次史學革命，「發明」了歷史學。[17]在此一學術革命中，希臘史家發展出一套「批評」的方法，以理性的態度考究希臘人一直奉作歷史的「史詩」，試圖從中區辨出「神話」與「事實」，並根據梳理出的事實重建古希臘的真實歷史。[18]史家須如何才能書寫真實的歷史？應如何取得可靠的史實？什麼證據才屬可信？這些都是希臘史學革命引出的問題，也是向來史家關心的議題。

「歷史之父」希羅多德在《歷史》（*ιστορία*; *The Histories*）中開宗明義寫道：

> 這裡發表的，是哈利卡爾索斯人希羅多德探究的成果。他之所以發表這些探究成果，是為了保存人類的功業，不致因年深日久而遭到遺忘，為了使希臘人與異邦人值得讚嘆的豐功偉績，不致失去光彩。[19]

根據希羅多德，史家書寫歷史的目的是為「保存」人們的事蹟，

---

[17] J. B. Bury, *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 (London: Macmillan & C., 1909), p. 1.

[18] 有關希臘的史學革命，參見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p. 30-34.

[19] 希羅多德（Herodotus）著，王以鑄譯，《歷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上冊，頁1。

而事蹟一閃即逝，須經過「探究」的功夫，才能發現與保存。他的書取名「ιστορία」（historia），在希臘文中即是「探究」或「經由探究獲得知識」之意。

希羅多德《歷史》的主題是「波希戰爭」（Persian Wars, 499-449B.C.）。他本人經歷這場戰爭，書寫的是他的當代史。不過，希羅多德為理解波斯入侵希臘的原因，覺得有必要認識波斯歷史與文化，這一動機驅使他跨出當代史，致力於探究波斯、西亞古代史。希羅多德秉持「口傳」資料為主的書寫方法，走遍各地詢訪耆碩，蒐集古代史實。而在採集史實時，他秉持一個理念：「我的工作是把我被告知的事實記錄下來，至於相信它與否並不是我的職責。」[20]對他來說，史家的主要職責是記錄與保存事實，而非批評或論斷其真偽。[21]希羅多德收集各地奇風異俗、奇聞軼事，但當代希臘人見識淺薄，認為荒誕不經，很多人認定他在說謊。羅馬人受到希臘人的影響，也質疑其可靠性。西塞羅即說：「在歷史中，一切都應以事實真相作判準，……希羅多德這位歷史之父……敘述了無數虛妄的事。」[22]諷刺的是，希羅多德因《歷史》一書被尊為「史學之父」，卻也因不注意真偽的辨析而被譏為「說謊之父」。[23]

就可靠性來說，被當作典範的是比希羅多德晚一個世代的修西底德。修西底德是一個雅典公民，曾參與波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 431-404B.C.），指揮艦隊抵抗斯巴達有功，但因曾經貽誤過軍機，遭城邦放逐而退出戰爭。他有敏銳的歷史感，自始就看出這場內戰的意義，發奮要為之記錄，寫成《波羅奔尼撒戰爭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一書。修西底德

---

[20]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trans. with notes by George Rawlinson (Ware: Wordsworth Editions Ltd., 1996), p. 183.

[21] 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 36.

[22] Marcus Tullius Cicero, *De re publica & De legibus,* trans. C. W. Key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Ed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p. 301.

[23] J. A. S. Evans, "Father of History or Father of Lies: The Reputation of Herodotus," *The Classical Journal*, 64: 1 (October, 1968), pp. 11-17.

如何紀錄這場重要戰爭？和希羅多德一樣，他在證據上主要依賴口傳材料，但立下更嚴格的採信標準：

> 不要偶然聽到一個故事就寫下來，甚至也不要單憑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為根據；我描述的事件，不是我親自看見的，就是我從那些親自看見這些事件的人那裡聽到後，經過我仔細考核過的。就是這樣，真實還是不容易發現的：不同的目擊者對同一個事件，有不同的說法，由於他們或者偏袒這一邊，或者偏袒那一邊，或者由於記憶不完全。[24]

這段文字有兩個要點：其一，歷史書寫的主要依據是「見證」，而以史家的親自見證最可靠，他人的見證需經過嚴謹考核才可採納。修西底德對自己敘事的可靠性很有信心，強調自己沒有虛構故事。其二，假若史家親自見證才是可靠的證據，那麼他最可能書寫的信史就只有其親歷的「當代史」。對修西底德來說，只有當代史當得起「歷史」之名，因這是歷史家唯一可能發現真實的時期。[25]此外，修西底德的主題是希臘內戰，寫的是城邦政治與軍事，開啟政治史與軍事史的書寫傳統。實際上，對他來說，歷史就是政治史。[26]

從希羅多德到修西底德，希臘史學確立以「口傳」資料書寫「當代史」的傳統。這一個史學傳統後來由羅馬人繼承與發展。羅馬歷史家，從共和時期的撒魯斯特（Sallust, 86-35B.C.）、李維（Livy, 59B.C.-A.D.106）到帝制時期的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c. 56-c. 117），無不摹仿修西底德史學，以其方法書寫歷史。[27]撒魯斯特著《卡提連戰爭》（*Bellum Catilinae*）與《朱古達戰爭》

---

[24] 修西底德（Thucydides）著，謝德風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上冊，頁20。

[25] Stephen Usher, *The Historians of Greece and Rome* (New York: Taplinger Publishing Co., 1970), p. 28; M. I. Finley,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 18-19.

[26] 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p. 41, 44-45.

[27] 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 47.

（*Bellum Jugurthinum*）二書，前者寫西元前63年羅馬元老卡提連（Catiline, c. 108-62B.C.）反共和的陰謀，後者敘述西元前111 年至105年羅馬對北非努米迪亞（Numidia）的戰爭，都是作者自身見證的當代史。塔西佗《編年史》（*Annales*）與《歷史》（*Historiae*），寫西元 14年至 96年的羅馬帝國，也是個人部分親歷的晚近史事。這些史書寫的都是政治史與軍事史。

李維的《羅馬史》（*Ab Urbe condita*）敘述西元前753年羅馬建城以來的歷史，全142書。這部史著傳世的只有35書（1-10 書、21-45書），保存西元前753至167年大部分的敘事，當代部分則全部失傳。從傳世的部分評斷，李維史學基本上是遵循修西底德傳統，例如：書寫方式以時序為軸，將史實系統地編排在一編年框架內；敘事主題是政治史與軍事史；主要倚賴史家見證或口述，而非檔案文獻。然而，李維史學也有不同之處。首先，修西底德只寫當代史，李維則推到羅馬的起源，涵蓋全部羅馬史。其次，修西底德主要倚賴史家的個人見證，李維則使用過去史家撰寫史書，並視之為當然。[28]《羅馬史》的當代部分已經佚失，我們無法探知李維運用何種史料來建立敘事，但古代部分明顯是倚靠過去史家的既有史著，即所謂的「敘事性史源」。[29]而即便有原始資料，李維也不覺得必須要加以參證，而逕使用二手敘述。[30]其三，對修西底德來說，敘事的真實重於文字的華麗，李維則重視文字修辭，有時甚至為修辭目的而忽略敘事的準確。[31]

李維確立古典史學的書寫典範。《羅馬史》從羅馬起源寫到帝制初期，確立一種長期、宏觀的敘述形式；李維倚賴過去史家的著作來寫古代史，成為書寫當代以前歷史的新慣例；他重視文

---

[28] P. G. Walsh, *Livy: His Historical Aims and Metho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113-114.

[29] 根據Walsh的研究，李維引用的羅馬史家包括：Valerius Antias, Claudius Quadrigarius, Licinius Macer, Aelius Tubero, Fabius Pictor, L. Calpurnius Piso, Coetius Antipater, Polybius, Cato, Posidonius, Sisenna, Asinius Pollio, Caesar 等。參見P. G. Walsh, *Livy: His Historical Aims and Methods*, pp. 114-137.

[30] P. G. Walsh, *Livy: His Historical Aims and Methods*, pp. 110-114.

[31] P. G. Walsh, *Livy: His Historical Aims and Methods*, pp. 151-153.

字修辭與垂訓功能，彰顯歷史的實用價值。不過，在古典時代結束後，李維的史學傳統漸遭到遺忘，直到文藝復興時代才重新被認識。中世紀史學的主流是修道院的「年鑑」（Annals），是一種以教會史觀為框架的單純紀事編年，不是一種「完整的歷史」。[32]

（二）人文主義史學的發展

十四世紀義大利發生文藝復興，歷史學在人文運動影響下有新的發展。文藝復興的重要工作是「復古」，人文學者如史家所說試圖「重新發現、復活古羅馬文明的內在精神」，期望「在一個業已失去、然可回復之古代的基礎上，創造一個新文化」。[33]復古工作的核心是古代典籍的發掘與考訂，在這過程中古代史家的著作也陸續重見天日。到十六世紀初，撒魯斯特、凱撒（Julius Caesar, 100-44B.C.）、李維和塔西佗等羅馬史家已普遍為人文學界認識。[34]

古典史家著作的再發現對文藝復興史學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當時，一批佛羅倫斯人文學者拿古典史家作典範，摹仿其治史理念與方法，擺脫中世紀枯燥的年鑑傳統，開創「人文主義史學」（humanist history）。[35]理念上，人文主義史家傳承古典史學追求真實、重視文采與強調訓誡的理想，主張史家的職責是探索事實真相，並以雄辯的文采敘事，說服讀者接受歷史的道德訓

---

32 有關中世紀「年鑑」，參見Denys Hay, *Annals and Historians: Western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Eigh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77), pp. 38-62.

33 Charles G. Nauret, Jr., *Humanism and the Culture of Renaissance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2.

34 參見 Peter Burke, “A Survey of the Popularity of Ancient Historians, 1450-1700,” *History and Theory*, 5: 2 (1966), p. 137, ‘Table 2’; 楊肅献，〈從人文主義史學到哲學的歷史：吉朋歷史書寫的近世歐洲史學脈絡〉，《臺大歷史學報》，62（臺北，2018.12），頁144-145。

35 Felix Gilbert,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 Century Florence*, pp. 206-207.

誡。[36]

布魯尼（Leonardo Bruni, 1370-1444）、畢揚多（Flavio Biondo, 1393-1463）與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 1459-1527）是最具代表性的人文主義史家。他們以李維《羅馬史》作典範，歷史書寫的重心均放在晚近時期，即他們的當代史。布魯尼在《佛羅倫斯人民史》（*Historiarum Florentini populi*）12 書中，以 3 書敘述他所處的十五世紀；畢揚多《羅馬帝國衰亡史》（*Decades Historiarum ab inclinatione Romaorum inperii*）32 書，當代史占了 12 書；馬基維利的《佛羅倫斯史》（*Istorie Fioretine*）全 8 書，卻以四書篇幅敘述麥迪奇家族掌權的 60 年（1434-1492）。他們雖都將歷史敘述追述到古代或起源部分，然而大都寫得相對簡略。

在史料方面，人文主義史家循古典史學的成例，主要是採用、統合與改寫既有的「敘事性史源」，亦即過去史家根據見證書寫的敘事，而不是以文獻檔案等一手資料來建立敘述。布魯尼的佛羅倫斯史，當代以前部分是以過去的史書為史源。古代部分（第1書），他使用李維的《羅馬史》、歐羅西烏斯（Paulus Orosius, c. 375-c. 418）的《反駁異教徒》（*Historiarum Adversum Paganos*）、狄亞科努斯（Paulus Diaconus, c. 720-c. 800）的《羅馬史》（*Historia Romanorum*）和《倫巴底史》（*Historia Langobardorum*），及普羅科匹烏斯（Procopius, c. 500-c. 562）的《哥德戰史》（*Bellum Gothicum*）。中世紀部分（2 書至 8 書），他主要根據中世紀年鑑史家維藍尼（Giovanni Villani, c. 1276/1280-1348）的《新年鑑》（*Nuova Cronica*），輔以康班尼（Dino Compagni, 1255-1324）《年鑑》（*Cronica*）、史蒂凡尼（Machionne di Stefani, 1336-1385）《佛羅倫斯年鑑》（*Cronica fiorentina*）。至於最近部分（10書至12 書），他採用皮逖（Buoncorso Pitti, 1354-1430）的《年鑑》（*Cronica*）與達逖（Gregorio Dati, 1362-1435）的《歷史》（*Istoria*）。[37]

---

[36] Robert Black, “Benedetto Accolti and the Beginnings of Humanist Historiography,” pp. 36-38.

[37] Donald J. Wilcox, *The Development of Florentine Humanist Historiograph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34, n. 32.

畢揚多同樣也主要依據既有「敘事性史源」來撰寫羅馬帝國衰亡史。在寫前20書時，他使用了《教宗行傳》（*Liber Pontificalis*）、西格貝爾特（Sigebert of Grembloux, c. 1030-c. 1112）的《年鑑》（*Chronicon sive Chronographia*）、波羅努斯（Martinus Polonus, 十三世紀）《教宗與皇帝年鑑》（*Chronica pontificum et imperatorum*）、文森（Vincent of Beauvais, c. 1184/1194-c. 1264）《史鑑》（*Speculum Historiale*）、維藍尼的《新年鑑》，及泰爾大主教威廉（William of Tyre, 1130-1186）《拉丁諸王史績》（*Historia rerum in partibus transmarinis gestarum*）和迪・威萃（Jacques de Vitry, c. 1160/1170-1240）的《十字軍史》（*Historia Orientalis*）。他也引用狄亞科努斯《倫巴底史》、喬丹尼斯（Jordanes, 六世紀拜占庭史家）《哥德人史》（*Getica*）、教宗格列哥里（Gregory the Great, c. 540-c. 604）的著作、《法蘭克王國史》（*Gesta regum Francorum*）、愛因哈德（Einhard, c. 775-c. 840）《查理大帝傳》（*Vita Caroli Magni*）等。在十到十三世紀部分，他大量利用中世紀年鑑，包括盧卡的托勒密（Ptolemy of Luca, c. 1236-1327）《年鑑》（*Annales*）和單多羅（Andrea Dandolo, 1306-1354）《威尼斯年鑑》（*Chronicon Venetum*）。[38]

人文主義史家和古典史家一樣，堅持史家的職責是追求「真實」，但如何達到歷史真實？實踐上，人文主義史學所說的「真實」指的是書寫歷史時態度要「客觀」（impartiality），而敘事須「精確」（accuracy）。[39]敘事精確的標準則是依照史家採用之史源的可靠性來斷定。人文主義史家，如前所述，一般是採用「敘事性史源」，即史家或時人對事件的當下紀錄或追述。他們和古典史家一樣，尚未建立以一手史料寫史的觀念；對他們而言，一手史料只是書寫的輔助，用以印證既有敘事，而非必備資料。但是，敘事性史源的取捨標準為何？根據古典史學，敘事者

[38] 參見 Denys Hay, “Flavio Biondo and the Middle Ages,” p. 49.

[39] Donald J. Wilcox, *The Development of Florentine Humanist Historiograph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p. 14; Robert Black, “Benedetto Accolti and the Beginnings of Humanist Historiography,” p. 38; 楊肅献，〈從人文主義史學到哲學的歷史：吉朋歷史書寫的近世歐洲史學脈絡〉，頁161。

愈接近事件發生的時與地，敘事愈可信，而又以史家個人見證最可靠。[40]

以布魯尼的《佛羅倫斯史人民史》為例，這部書在十三世紀中期到十四世紀中期部分主要是根據維藍尼的《新年鑑》，再輔以佛羅倫斯的官方檔案。[41]《新年鑑》共12書，後6書涵蓋1264年至1346年，乃是維藍尼親歷的時代，是中世紀晚期佛羅倫斯史的公認權威。[42]同樣，畢揚多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寫十字軍部分時，主要的史源是聖雷米的羅伯特（Robert of St. Remy, c. 1055-1122）《十字軍史》（*Historia iherosylimitana*）。羅伯特親身參與第一次十字軍（1096-1099），這部書記錄他見證的史事，被認為是可靠的史源。另一位史家亞柯爾提（Benedetto Accolti d'Arezzo, 1415-1464）也撰寫《十字軍史》（*De Bello*），他主要採用泰爾大主教威廉的《拉丁諸王史績》，也參採聖雷米的羅伯特的《十字軍史》和沙奴多（Marin Sanudo, c. 1260-1343）的《十字軍秘錄》（*Liber secretorum Fidelium Crucis*）。[43]泰爾的威廉出生於耶路撒冷，活躍於十字軍在東方建立的拉丁王國，又擔任泰爾大主教，熟悉十字軍史事。他雖然出生較晚，不及見證第一次十字軍，但其書兼採前人紀述與自己的聽聞，仍具有史學價值。[44]

人文主義史家不會刻意區別敘事性資料與原始史料，也不覺得原始資料比一般史書更具有史料的價值。他們並沒有排斥引證檔案或文獻史料：布魯尼本人擔任佛羅倫斯的總理，在寫佛羅倫

---

40 Felix Gilbert,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 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 Century Florence*, p. 222.

41 Robert Black, "Benedetto Accolti and the Beginnings of Humanist Historiography," p. 42.

42 有關維蘭尼的史學，參見Louis Green, *Chronicle into History: An Essay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in Florentine Fourteenth-Century Chronic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9-43.

43 Robert Black, "Benedetto Accolti and the Beginnings of Humanist Historiography," pp. 39-41.

44 有關威廉．泰爾的生平與史學，參見Peter W. Edbury and John Gordon Rowe, *William of Tyre: Historian of the Latin E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斯歷史時多少會運用到官方的檔案或資料。[45]畢揚多是古物學者，在敘述晚近歷史時偶爾也引證文獻與考古資料，包括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與佩托拉克（Francesco Petrarch, 1304-1374）的書信，教廷書函、權狀、詔令與記事錄，格拉先（Gratian, 十二世紀教會法學者）編訂之《教會法令》（*Decretum Gratiani*），甚至羅馬的古建築等。[46]不過，在他們眼中，檔案、文物等一手資料並非主要的史源，大都只屬於輔助的用處。

人文主義史家看待和運用資料的方式，影響到其撰史的方法。現代史家治史通常是把蒐集的資料當作個別的證據：他們先將蒐集的資料全部匯集一起，再將這些資料分別安置在適當的地方，完成一個基本上重建的故事。人文主義史家撰史則循一個定規：找到一個主要的可靠史源，通常是過去史家的既成史書，然後緊隨著其敘事來進行敘述，再以其他作者的敘事來補充不足。[47]畢揚多敘述五世紀羅馬帝國時，主要是根據狄亞科努斯的《羅馬史》與《倫巴底史》；寫到哥德人史事時則採用普羅科匹烏斯《哥德戰史》；到第八世紀時又回到狄亞科努斯的《倫巴底史》；而敘述到第九世紀至十字軍東征時期，則採用盧卡的托勒密的《年鑑》。[48]換言之，人文主義史家書寫古代史時，基本上是以現成的「敘事性史源」為本，對其進行整理、修飾與改寫，而不是根據原始資料來重寫全新的歷史。

人文主義史家相信史家的見證是最可靠的資料、撰史的主要根據。他們由是養成一種信念，認為羅馬史已由李維、塔西陀、蘇東尼烏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 c. 69-140）等古典史家書寫完備，後世史家沒有理由、也不可能重新寫過，即便重寫也不可能

---

45 Felix Gilbert,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 Century Florence*, p. 221, esp. n. 36.

46 Denys Hay, “Flavio Biondo and the Middle Ages,” p. 49.

47 Denys Hay, “Flavio Biondo and the Middle Ages,” p. 50; Felix Gilbert,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 Century Florence*, p. 221.

48 參見Denys Hay, “Flavio Biondo and the Middle Ages,” p. 50.

超越古代史家。[49]直到十七世紀，這一種心態仍在歐洲學界根深蒂固，英國哲學家培根就宣稱：

> 我不期望能給希臘一部從帖西烏斯（Theseus）到菲羅波伊門（Philopoemen, 253-183B.C.）時期的完整歷史；……或給羅馬一部從羅慕拉斯（Romulus）到查士丁尼（Justinian I, 483-565B.C.）時期的完整歷史。……在這一系列歷史中，前者有修西底德與贊諾芬（Xenophon, c. 428-c. 354B.C.），後者有李維、波力比烏斯（Polybius, 200-118B.C.）、撒魯斯特、凱撒、阿比安（Appianus, 95-165）、塔西陀與希羅迪安那斯（Herodianus, c. 170-240）等。這些都應全部保留下來，毋庸任何修減，只須增補或續加。[50]

在培根眼中，希臘與羅馬時代的既有歷史寫作「已經臻於完整的境地」，而現代歷史家既無法重返古代去再見證古代史，自不可能再寫出比古代史家的史著更貼近真相、更接近真實的古代史。總之，後代史家不可能重寫古代史，至多只能對前賢的經典加以「增補或續加」。

三、歷史懷疑論與人文主義史學的危機

到十六世紀，人文主義史學的理論與實踐開始遭受強烈的質疑，陷入一種嚴重的學科危機。此一挑戰主要來自「歷史懷疑論」（historical pyrrhonism）的興起，從根本上去質疑人文主義歷史書寫的有效性。

---

[49] Arnaldo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p. 6.

[50] Francis Bacon,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London: J. M. Dent & Sons, 1962), p. 75. 培根所謂的「完整的歷史」，是指能將史事完整地呈現的歷史書寫，而依書寫題材，又分為「編年」（chronicle）、「紀傳」（live）與「敘事」（narration or relation）三種；「編年」以「時間」（time）為主軸，「紀傳」以「個人」（person）為主體，「敘事」則以「行動」（action）為主體。在他眼中，這些書寫類型都屬於「正規的歷史」（just history）。

（一）比羅懷疑論的興起

歷史懷疑論源於哲學上的「比羅懷疑論」（Pyrrhonism）。比羅懷疑論起源於西元前三、四世紀的希臘。當時，希臘城邦政治陷入危機，人們對理性主義喪失信心。有位名叫比羅（Pyrrho of Elis, c. 360-275B.C.）的哲人倡導懷疑思想，主張：「理性」無法透視事物的內在實體，充其量只能揣知事物表相；每個人站在不同角度，對事物的所見與所知各異，真偽對錯遂無從絕對判定；人既然無法確知一切事物的實相，就應終止判斷，而在判斷事物時應以概然的語辭來表達。[51]西元三世紀，羅馬治下的希臘哲學家塞克斯塔（Sextus Empiricus, c. 160-210）著《比羅懷疑論大綱》（*Hypotyposes*，英譯 *Outlines of Pyrrhonism*）與《對各種學者的批判》（*Adversus mathematicos*）二書，[52]闡述比羅懷疑論思想，形成一個獨特的懷疑學派。

塞克斯塔提出一種真理標準的論式：在討論真理時一旦遇到爭議，必須有一個標準來判定真理屬誰；而「為斷定有關此一真理標準之爭議，則又必須提出一個大家先行接受之標準，以憑判定這一爭議；然為了取得此一先行接受之標準，對此一先行接受標準之爭議又須先行加以斷定」。如此一來，整個討論就陷入無止境的關於真理標準的爭議，而真理的探尋遂不可能。[53]塞克斯塔以這種方法，對各種學問與教條的立論基礎進行全面性攻擊，質疑任何聲稱可達到「真理」的可能性，導致一種知識的虛無主義。

文藝復興時代，塞克斯塔的著作隨著希臘古籍的傳入義大利，再度出現在西歐學界。[54]1490 年代，佛羅倫斯人文學圈開始

---

[51] 參見傅偉勳，《西洋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1987），頁166-167。

[52] *Adversus mathematicos* 書名字面意思是「對數學家的批判」，但此書的前 6 卷全面地批評各種學問，被稱為「對各種學者的批判」（*Against the Professors*）。

[53] Sextus Empiricus, *Outlines of Pyrrhonism*, trans. R. G. Bur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E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book 2, chapter 4, sec. 20, pp. 163-165.

[54] 十五世紀以來比羅懷疑論在西歐重現的過程，參見 Richard H. Popkin, *The History*

討論塞克斯塔著作，哲學家比哥（Giovanni Pico de la Mirandola, 1463-1494）與神學家沙凡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 1452-1498）是主要宣揚者。沙凡納羅拉是一個修士，在佛羅倫斯聖馬可修院（Covent of Saint Marco）宣教，深受歡迎。1494 年，他在佛羅倫斯煽動群眾，發動政教改革，建立一個神權政權。在哲學上，沙凡納羅拉質疑「自然的」知識的確定性，而主張唯有「啟示的」知識才是真理。1497 年至 1498 年間，他與教廷發生神學爭議，曾以類似比羅懷疑論的論法，質疑教宗與教務會議可作為教會真理的判準，強調《聖經》才是最高權威，透過信心獲得的啟示才是信仰的最終判準。[55]1498 年，沙凡納羅拉的政權遭推翻，他本人受到異端審判死在火刑柱上，但其神學理念並未消失。

1517 年 10 月，德意志教士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在威丁堡引發宗教改革運動。在與教廷的爭議中，路德以類似比羅懷疑論方法，挑戰羅馬教會的權威。1520 年，他在《告德意志貴族書》（*The Appeal to the German Nobility*）中，否定羅馬教宗是宗教事務最高權威。路德主張基督教只有一部共同的《聖經》，乃是上帝啟示的聖典、真理最高權威。但《聖經》常有晦暗不明之處，易生詮釋的爭議，而一旦遇到這類狀況，是非如何斷定？1521 年，路德在烏爾姆帝國會議（Diet of Worms）上回答了這個問題。在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與教廷代表面前，路德以堅定的語氣表明不接受教宗和教務會議是真理的最高權威，因這在《聖經》中毫無根據，況且兩者明顯常有錯誤或自相矛盾。他強調一切真理都須以《聖經》為依歸，而個人「良心」在信仰引導下對《聖經》的理解，才是真理之判准。[56]路德以個人良心取代教宗權威作為真理判准的立場，震撼羅馬教會及其支持者。著名人文學者伊拉斯莫斯（Desiderius Erasmus, c. 1466-1536）雖對教會多所批評，卻不認同路德激進的神學立場而發文批評，導致一場神學論戰。[57]

---

of Scepticism: From Savonarola to Bayle, pp. 17-27.

55 Richard H. Popkin, *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From Savonarola to Bayle*, pp. 3, 22.

56 Richard H. Popkin, *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From Savonarola to Bayle*, pp. 4-5.

57 有關路德和伊拉斯莫斯這場神學論戰，參見Steven Ozement, *The Age of Reform,*

1524 年，伊拉斯莫斯發表《論自由意志》（*De libero arbitrio diatribe*）一文，批評路德對「自由意志」的詮釋。人在上帝面前是否保有自由意志？這是個爭論不休的神學難題：傳統教會接受阿奎納派（Thomism）觀點，主張人有自由意志；路德受到奧古斯丁派（Augustinism）影響，則強調人的意志受原罪的束縛而無法自由。針對此一爭議，伊拉斯莫斯建議人們最好保持謙虛態度，避免妄下論斷：愚鈍如他自己，寧可循懷疑論的作法，擱置自己的判准，而接受教會的詮釋。他憂心路德「良心」說將鼓勵個人主義的聖經詮釋，導致信仰的虛無主義。總之，伊拉斯莫斯在真理判准問題上態度比較審慎，對自己無法理解之處寧可接受教會的傳統權威。[58]

宗教改革以後，羅馬教會與新教長期陷入正當性的爭議，路德與伊拉斯莫斯的論點則為兩個陣營提供論爭的武器。在交鋒中，雙方神學家均以比羅懷疑論論法，揭發對方神學根基的不可靠性，有陷入懷疑主義之虞，意圖顛覆對方神學教條的真理價值與正當性。

羅馬教會恆訴諸教宗權威、教務會議或教會傳統，但新教教派懷疑這類傳統權威可以證明羅馬的觀點即代表真理，除非能證明這些權威確實是真理的判準。但要證明這些傳統權威是真理判準，須有個更高的判準來判定這些判準確實是判準。這樣就會陷入一種無休止的論證循環，宗教真理遂無法確定，羅馬教會將落入一種信仰不確定的狀態。[59]相對地，新教教派主張「良心」是確認真理的最好方法：個人良知在上帝引導下可判定真理。但羅馬教派反過來質疑這種論點，擔心良心說會陷入主觀主義，無法成為真理的可靠判準。新教主張真理就在《聖經》中，可經由公正的檢視而獲得。羅馬教派則反擊說，聖經文字常曖昧不明，要如何判定其真義？而每個人都有「內在靈光」，會對《聖經》有不

1250-1550: An Intellectu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Late Medieval and Reformation Europ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90-302.

58 Richard H. Popkin, *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From Savonarola to Bayle*, pp. 8-9.

59 Richard H. Popkin, *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From Savonarola to Bayle*, p. 14.

同解讀。在羅馬教派看來，良心不過是一種「個人意見」，會造成眾生喧嘩的現象，需要一個更高判準來判定何者為真理。如此一來，新教教派就會陷入一種論證循環，無法確定宗教真理，陷入懷疑主義的深淵。[60]

（二）人文主義史學的爭議

到了十六世紀二十年代，比羅懷疑論的矛頭從神學論爭轉向對俗世學問的批判，歷史學也受波及。一些學者以懷疑論眼光質疑歷史家獲取歷史真實的可能性，從理論上顛覆歷史學存在的基礎，使歷史學陷入危機。歷史懷疑論的學者中，最著名的是日耳曼學者亞格瑞巴（Henricus Cornelius Agrippa, 1486-1535）與義大利學者佩崔紀（Francesco Patrizzi, 1529-1597）。他們從不同角度攻擊人文主義史學，質疑其「可信度」（fidelity）。他們都是虔誠的信仰者，在他們眼中，一切世俗學問均屬虛妄，唯有上帝的真理方是實在。

亞格瑞巴出生於科隆（Cologne），是羅馬教會堅定支持者，對文藝復興以來人文學者親近異教學問而輕視教會真理，深不以為然。1526 年，他出版《藝術與科學之不確定性與虛妄性》（*De incertitudine et vanitate scientiarum et artium declamatio invectiva*）一書，對俗世知識與學問進行全面攻擊，其本意是為基督教的真理價值進行辯護。[61]亞格瑞巴對俗世學問的批判波及歷史學，強烈質疑歷史知識的客觀性。他指出，歷史重視「條理、忠實、一致與真實」，但在實踐時卻常出問題。近代史發生在吾人的先人記憶時間之內，不應有說謊情事，但史家的敘事卻常互相矛盾，這中間必有人敘述不實。那麼，史家的敘事何以會互相矛盾？亞格瑞巴將這歸咎於人文主義史家的幾種「惡德」。[62]

人文主義史家第一項惡德是「輕忽」或「輕信」訊息來源。亞格瑞巴指出：多數史家不是生活在同一時間、或未出現在事件

---

60 Richard H. Popkin, *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From Savonarola to Bayle*, p. 14.

61 參見 Richard H. Popkin, *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From Savonarola to Bayle*, pp. 28-29.

62 Heinrich Cornelius Agrippa, *The Van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London: Printed by J. C. for Samuel Speed, 1676), p. 27.

現場、或與主事者不熟，敘事時大都依賴二手傳述而錯失「真相和確實」。在這方面，希臘的伊拉思都西尼斯（Eratosthenes, 276-194B.C.）、梅特羅多魯斯（可能指 Metrodorus of Scepsis, c. 145-70B.C.）、史丕提烏斯（Speptius）、波西東尼烏斯（Possidonius, c. 135-1B.C.）和巴特羅克利斯（Patrocles, c. 312-270B.C.）都曾受過指責。也有些史家僅在軍旅或旅行時走馬看花看過一些地方，便出手寫歷史。隨亞歷山大東征的歐諾西克瑞土斯（Onosicritus, 西元前四世紀）和阿瑞斯多布拉斯（Aristobulus, 375-301B.C.）對印度的報導即是。[63]

人文主義史家第二項惡德是「虛構」故事。亞格瑞巴發現有些史家為滿足幻想而「杜撰真實的歷史」，甚至「為求虛構故實而略掉全部真實」，如希羅多德、崔貝利烏斯（Trebellius Pollio，三至四世紀羅馬史家）和塔西陀。有史家把歷史變成虛構故事，例如：圭第烏斯（Guidius）、帖西亞斯（Ctesias, 西元前四世紀初）、賀克帖烏斯（Hecataeus, 西元前五世紀）等。更有人冒史家之名撰寫異域驚奇異事，如希羅多德、伊佛魯斯（Ephorus, 西元前四世紀）、馬契魯斯（Marcus Marcellus, ?-208B.C.）、史迪芬（Stephen the Grecian）、戴奧尼西烏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西元前一世紀）、普林尼（Pliny the Elder, 23-79）、史特拉波（Strabo, 64B.C.-c. A.D.24）、塔西陀、歐羅西烏斯和畢揚多。[64]

人文主義史家還有一種惡德：「顛倒是非黑白。」根據亞格瑞巴，這包含有幾種情況。有的史家雖然在事件現場或知道事件實情，卻囿於個人喜好而「違背歷史誠信，刻意把錯誤說成真實，留下錯誤敘述」。[65]例如，有人為替特殊人物開脫或辯護，便選對其有利之事加以敘述，而「刻意隱藏、跳過或淡化其餘，寫下不完整與訛誤的歷史」，如歐羅西烏斯。有些人出於恐懼、嫉妒或怨恨而背離真實，或意圖頌揚自己而中傷他人，「書寫的非事實之本然，而是自己期待的樣子」。古希臘作者常有這毛病，

---

63 Heinrich Cornelius Agrippa, *The Van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p. 27.

64 Heinrich Cornelius Agrippa, *The Van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p. 28.

65 Heinrich Cornelius Agrippa, *The Van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p. 29.

但近代史家也不遑多讓，如：薩貝利庫斯（Marcus Sabellicus, 1436-1506）和畢揚多的威尼斯史、葉米利歐（Paulus Emylius, 1460-1529）和高圭恩（Robert Gaguin, c. 1433-1501）的法蘭克史。不過，對亞格瑞巴來說，最可憎的是「阿諛奉承」。有些史家不惜替君主捏造譜系，以連結外國系譜和傳說，如：宏尼巴杜斯（Francus Hunibaldus, 六世紀）的法蘭克人史和維提辛杜斯（Vitiscindus）的薩克森史（Saxsons）。[66]還有作者寫歷史不是為追求真相，而是刻意塑造君王形象以取閱讀者。贊諾芬撰寫居魯士大帝（Cyrus the Great, 559-529B.C.）傳記，意不在呈現這位波斯帝國創建者的信史，而是在塑造「一個正義與英雄君王的典型」。[67]

總之，亞格瑞巴指責人文主義史家經常犯疏忽或輕信資料、刻意虛構事實和顛倒是非黑白的毛病，在書寫歷史時難以維持客觀公正。他對歷史家缺乏信心，相信在歷史裡找不到確實的真相：「沒有任何有關公共事務的書寫，能傳達真實真相，每個人都任憑己見，結果史家間存在諸多矛盾，對同一事件有時會寫出十分不同的版本。」[68]在論證過程中，古今重要的史家，從希臘的希羅多德、贊諾芬，羅馬的史特拉波、塔西陀，以至近代的畢揚多、高圭恩，其可靠性幾乎全面受到質疑。

歷史真相的探索包含有內、外兩個層次：一是史家能否客觀再現其見證的事實，一是史家能否從事件內部掌握到真相。亞格瑞巴討論的是前一個層次的問題，而威尼斯學者佩崔紀則檢視另一層面。佩崔紀曾在帕都瓦（Padova）大學研讀醫學和哲學，是一位新柏拉圖學派的哲學家。他在 1560 年發表《史學對話錄》（*Della historia diece dialoghi*）一書討論史學理論，其中觸及歷史真實的問題。[69]

---

66 Heinrich Cornelius Agrippa, *The Van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pp. 30-31.

67 Heinrich Cornelius Agrippa, *The Van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p. 31.

68 Heinrich Cornelius Agrippa, *The Van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p. 32.

69 Giorgio Spini, “Historiography: The Art of History in the Italian Counter Reformation,” in *The Late Italian Renaissance 1525-1630*, ed. Eric Cochran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970), p. 103.

在《史學對話錄》中，佩崔紀強調史家的工作「求真」高於「修辭」，但他對人文主義史家能否深入事件內部、觸及真正的真相，抱懷疑的態度。他以人文學者慣用的「反論」（antithesis）論法來論證。[70]歷史家撰寫歷史時可分為兩種情況：他要麼是與事件發生的時間同時，要麼不是。假如是後一種情況，則他因為不是事件的見證人，無法陳述歷史真實。但即便他確實與發生的事件同時，並見證了事件的發生，佩崔紀也懷疑他無法陳述歷史真實。何故？在這種狀況下，他分析說，史家或者是事件的同黨，或者是個中立人士。假若是事件的同黨，他就會為同黨利益而有強烈動機去歪曲、說謊，致使真相不彰，不是可信的史家。假如是個中立人士，他也難以獲知真相。佩崔紀認為，史家一旦保持中立立場，就會因不屬事件同黨而無法進入決策核心。如此一來，他就看不到事件內情、原委，記錄的歷史遂流於表象，觸不到內部的真實。總之，佩崔紀結論說：無論從那個角度，歷史家都不可能取得事實的真相，而人們遂難以期待可信的歷史出現。[71]

十六世紀中期以來，史家經常捲入當時的政治與宗教紛爭，歷史的書寫充斥宗派黨見，模糊了追求客觀真實的本質。這種現象似乎印證了懷疑論者對歷史書寫可靠性的悲觀評價。宗教改革以後，新教陣營積極改寫教會史，意圖提出一種符合新教立場的史觀，作為批判羅馬教會的歷史依據，並為新教改革的正當性提供歷史的辯護。[72]史特拉斯堡的歷史家史萊登（Johann Sleidan, 1506-1556）開啟宗教改革史的寫作，在1555年出版《查理五世時期宗教與國家史論》（*Commentariorum de statu religionis et reipublicae, Carolo V. Caesare, libri XXVI*），從 1517 年路德發動改革敘述到

---

70 人文學者喜歡以「反論」的方法來進行哲學論辯，最著名的是馬基維利，尤其是他在《君王論》（*The Prince*, 1513）中的論證方式。參見Quentin Skinner, *Machiavell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3.

71 Julian H. Franklin, *Jean Bodin and the Sixteenth-Century Revolution in the Methodology of Law and History*, pp. 96-102.

72 Donald R. Kelley, *Faces of History: Historical Inquiry from Herodotus to Herd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67.

1555 年的「奧古斯堡和約」（Peace of Augsburg），完整交代路德改革的過程。[73]史萊登蒐集手稿、檔案與出版資料，盡力維持客觀，敘事不偏廢羅馬教會的主張與行動，但主要目的是要彰顯路德改革的成就，試圖建構一個「新教視角的歷史觀」。[74]

史萊登的史著引起兩極化反應：新教陣營是一片讚揚之聲，公教陣營則大肆撻伐，斥為謊言。在論爭過程中，雙方均深入教會歷史，尋找己方信仰合法性與正確性的歷史根據。1559 年起，路德派史家伊利里庫斯（Flacius Illyricus, 1520-1575）編寫《馬格德堡世紀》（*Magdeburg Centuries*），從原初教會寫到十三世紀。伊利里庫斯刻意強調路德改革與原初教會的精神連結，並質疑教廷傳統的正當性。[75]面對新教史學的挑戰，教會史家巴隆尼烏斯（Caesar Baronius, 1538-1607）提筆為羅馬教會辯護。他自 1588 年起，陸續出版《教會史》（*Annales Ecclesiastici*），從羅馬教會立場力圖替教廷傳統與教宗至高性辯護。[76]巴隆尼烏斯主張教會屬於聖界，永不會墮落腐化，雖在不同時期有不同展現，但始終保持其原初的純淨。[77]

到 1619 年，威尼斯教士沙比（Paolo Sarpi, 1552-1623）又從教會史脈絡批判羅馬教會的「對抗改革」（Counter-Reformation）。他在《特倫特大公會議史》（*Istoria del Concilio Tridentino*）中指

---

[73] Donald R. Kelley, *Faces of History: Historical Inquiry from Herodotus to Herder*, p. 169.

[74] 有關史萊登的新教史學，最完整的研究是Alexander Hess 的 *Johann Sleidan and the Protestant Vision of History*，其中第五章討論史萊登的新教史觀。參見 Alexander Hess, *Johann Sleidan and the Protestant Vision of History*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8).

[75] Donald R. Kelley, *Faces of History: Historical Inquiry from Herodotus to Herder*, pp. 172-173; C. K. Pullapilly, *Caesar Baronius: Counter-Reformation Historian*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5), pp. 49-52.

[76] 關於《教會史》寫作，參見C. K. Pullapilly, *Caesar Baronius: Counter-Reformation Historian*, pp. 33-48.

[77] William J. Bouwsma, *Venice and the Defense of Republican Liberty: Renaissance Values in the Age of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p. 308-310.

出：教會是一個俗世制度，常因追逐權力與財富而腐化，腐化則激起改革，如此陷入永恆的循環；教會若想避免腐化，超脫循環，唯有揮別權力與財富，返回原初教會的純樸。[78]1545 年，羅馬教廷召開特倫特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推動改革以對抗宗教改革的浪潮。這本是羅馬教廷的改革契機，可惜教廷缺乏理想，狃於權勢與財富，使盡手段操弄會議，變本加厲加強教廷的權威。從改革角度言，沙比認為特倫特會議是一個完全的失敗。[79]

（三）歐洲史學傳統的危機

在宗教改革的浪濤中，新教與羅馬教會均動員歷史家為己方的立場辯護，歷史學淪為意識形態的工具，模糊了追求真實的理想。在這種狀況下，歷史懷疑論更是甚囂塵上，傳統以「敘事性史源」為根據的歷史書寫的可靠性橫遭質疑，人文主義史學充滿危機。這一種對歷史可靠性的質疑，從十七世紀一直延燒到十八世紀初，形成一種史家所謂的「歷史意識的危機」。[80]

從十七世紀中期，歐洲學界熱烈地爭論歷史知識的可能性、限制和基礎等課題，特別在法國人文學界。其中，懷疑論哲學家出而批判歷史知識的可靠性，為歷史懷疑論推波助瀾。笛卡爾（Rene Descartes, 1596-1650）在《方法論》（*Discourse on Method*, 1637）中貶低歷史的價值。他承認讀歷史可和「其他時代交談」，有助於認識過去；然而，他提醒說，過度沉緬過去往往會導致對當代無知。更重要的是，史書充斥虛構敘事，誤導人們去想像不可能的事件；而最可靠的敘事，即便沒有刻意作錯誤或誇大陳述，至少總是「遺漏最低微和不顯著的情境」，以致「保存下來者無法呈現真實」。[81]笛卡爾之後，拉莫特（Francois La Mothe Le

---

[78] William J. Bouwsma, *Venice and the Defense of Republican Liberty: Renaissance Values in the Age of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pp. 603-609.

[79] William J. Bouwsma, *Venice and the Defense of Republican Liberty: Renaissance Values in the Age of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pp. 611-618.

[80] Peter Burke, “Two Crises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pp. 3-4.

[81] René Descartes, *Discourse on Method*, Everyman’s Library Edition. (London: J. H. Dent & Sons, Ltd.;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12, 1927), pp. 6-7.

Vayer, 1588-1672）和貝爾（Pierre Bayle, 1647-1706）等相續加入論戰。1668 年，拉莫特發表《論歷史的確定性》（*Du peu de certitude qu'il y a dans l'histoire*），主張歷史的目的在提供有用的典範，而非追求真相與精確。歷史敘事即便不精確，依然可提供可參照的範例。[82]貝爾則在1680年代初一次關於歷史確定性的爭論中，辯稱人們實質上不可能取得過去的確定知識。他對史家的誠信不具信心，譏諷他們和律師一樣會為迎合自己的需要而不惜扭曲事實。[83]

同時，一些古典學者受到歷史懷疑論影響，也以懷疑論方法檢證古代文史典籍，甚至徹底否定古代典籍的真確性或古史敘述的確定性。法國古典學者哈杜因與低地國古典學者波福（Louis de Beaufort, 1703-1795）是著名代表。

哈杜因是法國的耶穌會士與古典學者，在巴黎耶穌會學院（Jesuit College de Paris）教授古典、哲學與神學。他孜孜於古典學術，在文本考訂與古物研究方面均卓有成績。哈杜因尤其著意古錢幣的研究，1681 年發表一篇處女作，利用錢幣資料澄清羅馬學者普林尼《自然史》（*Naruralis historia*）一書的真實性。他提出一種看法，主張錢幣不像文本那樣容易偽造，提供的證據比文本可靠。不過，哈度因承認單憑古物無法解決所有古代文本真實性問題，遂又提出一套輔助方法，試圖從文本內部證據來考定文本的可靠性：文本內若出現不一致或時代錯誤的情況，即可認定是偽作。他重視語言的時代錯置問題，如拉丁文品質是否符合作者該有的水準、風格與語法是否符合時代特色。[84]

哈杜因運用上述方法考究古代的文本，宣稱在 1690 年代即質疑奧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和其同時代人的著作是偽作。他繼

---

[82] Anton Matytsin, "Historical Pyrrhonism and Historical Certainty in the Early Enlightenment," p. 245.

[83] Anton Matytsin, "Historical Pyrrhonism and Historical Certainty in the Early Enlightenment," p. 245.

[84] Daniel J. Watkins, "Skepticism, Criticism, and the Making of the Catholic Enlightenment: Rethinking the Career of Jean Hardouin," *Journal of Jesuit Studies,* 6: 3 (August, 2019), pp. 490-491.

而檢視希臘與拉丁文典籍，懷疑所有古代著作都同樣有問題。[85]1692 年 5 月，哈杜因宣告「偵破了整個騙局」：

> 我提到的批評家發現，幾個世紀前有個集團從事於捏造古代歷史，如我們現在看到的，但在那時並不存在；他知道他們作偽的確實時代和工作坊；在這件事上，他們借助西塞羅、普林尼、味吉爾的《田園詩》、賀瑞修的《諷刺詩》與《書信集》的著作。這位批評家相信，……整個古拉丁文獻，除少數銘文和編年（fasti）之外，只有這些是真實的。[86]

他宣稱：這批造偽者以一批古錢幣和少數真文本作材料，透過一批數學家、法學家、醫生、詩人、語言學家和翻譯家的協助，偽造了整個西方的文學遺產。[87]

哈杜因如何偵破此一「騙局」？他檢視古代典籍，宣稱作偽者在偽造過程中有意或無意間留下諸多線索。一種線索是有否錢幣證據：他曾以錢幣資料推證猶太史家約瑟法斯（Flavius Josephus, 37-c. 93）《猶太古史》（*Antiquitates Iudaicae*）是「偽作」。約瑟法斯提及希律王（Herod the Great, c. 73-4B.C.）重建耶路撒冷（Jerusalem）聖殿，但找不到紀念此一事蹟的錢幣可資印證；約瑟法斯又指出安提巴斯（Antipas, c. 20B.C.-A.D.30，統治 Galilee 和 Perea）乃是希律王後裔，但哈杜因認為這不可能，因沒有錢幣稱他「希律・安提巴斯」（Herod Antipas）。另一種是文本的內部線索。他透過內文的交叉比對，發現其敘事有不合情理與自相矛盾處，遂論定《伊尼亞斯》（*Aeneid*）應非味吉爾（Virgil, 70-119B.C.）所作，因爲一個創作優美《田園詩》的作家不可能犯此類錯誤。他又發現奧古斯丁《懺悔錄》（*Confessions*）中，這位教父青年時期的禱告辭出現有不相配的語詞，不可能是一位聖者會用的文

---

85 Jean Hardouin., *The Prolegomena of Jean Hardouin*, trans. E. Johnson (Sydney: Angus & Robertson. Ltd, 1909), pp. 10-11.

86 Jean Hardouin, *The Prolegomena of Jean Hardouin*, p. xx.

87 Anthony Grafton, “Jean Hardouin: The Antiquary as Pariah,” pp. 249, 254.

字，遂認定這部書應是後人之偽作。[88]

哈杜因提出一個理論，主張古代典籍，除西塞羅的著作、普林尼《自然史》、味吉爾《田園詩》（*Georgics*）、賀瑞修（Horace, 65-8B.C.）《諷刺詩》（*Satires*）與《書信集》（Epistles）外，全是十三世紀一批作偽者的傑作。而人們所熟悉的古籍，從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劇作家艾思其拉斯（Aeschylus, c. 523-c. 456B.C.）、索福克里斯（Sophocles, c. 497/496-c. 406/405B.C.）、優里仳底斯（Euripides, c. 480-c. 406B.C.）和詩人品達（Pindar, c. 518-c.438B.C.）以下，到羅馬的歐威德（Ovid, 43-c. A.D.17/18）、朱文諾（Juvenal）、史達提烏斯（Statius, c. 45-96）、坤體良（Quintilian, c. 35-c. 100）、塔西陀等，以至基督教教父奧古斯丁、史家優西比烏斯（Eusebius, c. 260/265-c. 339/340）、神學家阿奎納（Thomas Aquinas, 1225-1274）的著作，無一不是贋品。[89]

哈杜因的主張驚世駭俗，是一種極端的懷疑主義，現代史家視之為一種「病態」實例。[90]魯汶大學古典學教授波福則是另一類歷史懷疑論者。他在 1738 年出版《論羅馬前五百年歷史的不確定性》（*Dissertation sur L'incertitude de cing premiers siecles de l'historie romaine*），質疑古羅馬史家對羅馬建城以後五百年的書寫的確實性與可靠性，引起古典學界極大的爭議。[91]

波福的論證是：羅馬人原是一個落後的民族，擅長農耕與戰爭，長期侷於義大利一隅，無特殊事蹟可資記錄；且早期羅馬人粗陋無文，在前五百年不曾有過歷史家，沒有可靠的史著；更關鍵的是，西元前390年高盧人洗劫羅馬，放火焚城，歷史文物幾乎都付之一炬。由是，當西元前三世紀羅馬史家庇克特（Fabius Pictor,

---

88 Anthony Grafton, "Jean Hardouin: The Antiquary as Pariah," pp. 249-251.

89 Anthony Grafton, "Jean Hardouin: The Antiquary as Pariah," pp. 251-254.

90 Arnaldo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p. 16.

91 有關Louis de Beaufort的生平與學術，參見Ronald T. Ridley, *Gibbon's Complement: Louis de Beaufort* (Vewezia: Istituto Veneto di Scienze Lettere ed Arti, 1986). 《論羅馬前五百年歷史的不確定性》一書在1740年也譯成英文出版，參見Louis de Beaufort, *A Dissertation upon the Uncertainty of the Roman History during the First Five Hundred Years*, in Two Parts.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London: T. Walter, 1740). 本文引用此一版本。

西元前三世紀）著手撰寫羅馬史時，因缺文獻以資參證，只依賴虛構故實與民間傳說，其書的可信度遂成問題。當後世史家如李維等再寫羅馬史時，又根據庇克特的史作，未對其嚴格檢視，只在修辭上下功夫，寫成的史書自然也不可靠：「羅馬史的作者敘述早期歷史時，只是相互抄襲，認為與其留白，不如插入明知是虛構的故事，以糊弄讀者。……他們很少借助考證方法，來確定其該有的可信度。」[92]

事實上，波福認為，羅馬早期的史料並非完全闕如。根據李維，羅馬人在高盧人撤離後，曾努力從大火中搶救文物，包括《十二表法》（*Twelve Tables*）、與鄰邦簽訂的條約、大祭司的文書、雕像與銘文等資料。這些都是珍貴的原始文獻，羅馬史家若能參證，對歷史書寫應有極大助益：「這些原始紀錄可以大大地照亮他們的著作，賦予其一種無可置疑的確定性。」可惜，波福感嘆說，羅馬史家並未「從這麼純正的源流中汲取溪水」。[93]實際上，羅馬史家對自己的歷史十分陌生，不熟悉、也未查證這類有用的原始文獻，以致「我們被教授的全部羅馬史，幾乎都是不確定的與虛妄的，全然不可信」。[94]

四、古物學的發展與歐洲史學的新動向

在歷史懷疑論之衝擊下，人文主義歷史書寫的可信度深受質疑，動搖了歐洲史學的立足基礎。面臨此一史學危機，歐洲史學界有何化解之道？當時的歷史家嚴肅看待此一危機，並積極在理論與實踐上尋求重建歷史信譽之道。

（一）證據的可靠性：從文本到古物

歷史懷疑論者基本上並不否認「過去」是一種客觀存在，雖

---

92 Louis de Beaufort, *A Dissertation upon the Uncertainty of the Roman History during the First Five Hundred Years*, pp. 5-8.

93 Louis de Beaufort, *A Dissertation upon the Uncertainty of the Roman History during the First Five Hundred Years*, pp. 38, 395-398.

94 Louis de Beaufort, *A Dissertation upon the Uncertainty of the Roman History during the First Five Hundred Years*, p. 40.

然他們質疑人文主義史學客觀呈現此一「過去」的可能性。[95]這其中的關鍵，在於他們對傳統史家依賴的「證據」的可靠性失去信心。因此，史學界若要重建歷史的信譽，就必須提出一套關於證據的新論述，為歷史書寫的可靠性進行有力的辯護。

歐洲史學界對歷史懷疑論的一種回應，是主張以更嚴謹的方法來確定史家敘事的可信性。法國學者沙利葉（Claude Sallier, 1685-1761）認為，近代史家即便無法直接接觸羅馬的原始資料，但羅馬史家若都提到這些史料，即可推斷其曾存在過，而羅馬史家的敘事應屬可靠。日耳曼學者沙克西烏斯（Christoph Saxius, 1714-1806）則主張應當信賴古代史家，強調有了李維這類權威之背書，古羅馬史即便有虛構與想像之處，大部分的敘事應仍屬可信。[96]法國學者馬比揚（Jean Mabillon, 1632-1707）則具體提出一重「三層判定法」，主張依據史家和所述史事在時間上的距離，來論斷其可信度：與史事發生時間同時者最可靠，其次是接近同時者，再次是更遠者。此外，也有學者強調專業訓練與道德操守對史家之誠信的重要。[97]

不過，這一類回應其實大都是人文主義史學的陳腔濫調，實乏新意，難以說服歷史懷疑論者，不足以化解歷史意識危機。另一種回應則訴諸當時的「古物學」（antiquarianism），主張古代文物可據以重建可信的古代史。這一種回應強調物質遺留作為歷史證據具有相對的可靠性，主張古代文物，包括錢幣、銘文、紀念章、雕像、建築、文獻等，是古人遺留下來的具體遺跡，乃是古代歷史最可靠的直接「見證」。[98]

文藝復興以來，古典學界在古物研究上蓬勃發展，特別是在

---

95 Anton Matytsin, “Historical Pyrrhonism and Historical Certainty in the Early Enlightenment,” p. 248.

96 Anton Matytsin, “Historical Pyrrhonism and Historical Certainty in the Early Enlightenment,” pp. 250-251.

97 Anton Matytsin, “Historical Pyrrhonism and Historical Certainty in the Early Enlightenment,” pp. 252-253.

98 Peter Burke, “Two Crises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pp. 7-8.

錢幣和銘文的蒐集與探究上有可觀成就，卻長期不受正統史家的正視。然而，面對歷史懷疑論的挑戰，古物研究竟成為化解歷史意識危機的有力武器。1683 年，法國古物學者史鵬（Jacques Spon, 1647-1685）論及古物學者在浩瀚的古代世界進行發現，抱怨說：「我們發掘所有王國和帝國的錢幣，我們解讀數千種古羅馬的古董珍奇，但我們的父執輩僅視為是一些無聲的、毫無靈魂與奧秘可言的字母而已。」[99]而在他看來，透過這些文物，古人「試圖將他們所處時代的宗教、歷史、政治和其他的藝術與科學，散播和傳遞給後代」。[100]古代文物保存了古代制度與信仰的豐富材料，也是可驗證古代重要史事的具體紀錄，賦予歷史一種一般文本無法提供的「知識論的堅實基礎」。在爭議聲中，歐洲史學界終在古物研究中找到一種有力的回應，誠如美國歷史家葛拉夫頓（Anthony Grafton）所說：「古物研究緩解、甚至最終擊敗了懷疑主義。」[101]

近代歐洲的古物研究始自人文運動之父佩托拉克。佩托拉克本人除了搜求、考訂古籍，也考察、研究古文物。1337 年，他首度造訪「永恆之城」，即受到羅馬四處可見的古蹟的吸引，而致力考察羅馬的地誌，尋訪古羅馬藝術，蒐集錢幣與銘刻等，並嘗試以古物的資料來考定古典文本。[102]佩托拉克開啟古物研究的風氣，並認知文物的史料價值，不過他對古物研究的興趣遠不及對古籍的熱衷。事實上，在文藝復興早期，古物研究仍是依附在古籍研究下面，沒有被獨立看待。至一個世紀後，兩者的相對重要性才有所改變。

---

99 Jacques Spon, *Recherches curieuses d'antiquité* (Lyons: Amaulry, 1683), 'Preface'. 引文中譯參考Anthony Grafton, "Jean Hardouin: The Antiquary as Pariah," pp. 255-256.

100 Jacques Spon, *Miscellanea eruditae antiquitatis* (Lyon: Sumptibus Fratrum Huguetan & Soc., 1685), 'Praefatio', p. a3. 引文中譯參考 Anthony Grafton, "Jean Hardouin: The Antiquary as Pariah," p. 256.

101 Anthony Grafton, "Jean Hardouin: The Antiquary as Pariah," p. 256

102 John E. Sandys,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 1964), vol. 2, p. 4; Roberto Weiss, *The Renaissance Discovery of Classical Antiquity*, 2nd edi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pp. 30-38.

1440年代，威尼斯古典學者西里阿庫斯（Cyriacus of Ancona, 1391-1452）進一步體認到古代文物對重建古典文明的功用。西里阿庫斯是義大利東岸教廷領地安科納人，與威尼斯有密切的政、商和文化聯繫，曾經多次造訪威尼斯。他養成深厚的人文主義關懷，對古代文物尤感興趣。1420 年代初，西里阿庫斯考察安科納一座二世紀的「圖拉真凱旋門」（Arch of Trajan），仔細檢視上面的銘文，首度發現銘刻作為原始歷史證據的價值。[103]其後，他遍遊義大利、愛琴海與近東各地，尋訪古代遺跡，考察各種紀念建築、廢墟、錢幣、寶石、雕刻，並親手繪製圖像、抄錄銘文，並註釋說明，累積六大卷的古物資料，是認識古代世界的一手史料。[104]

對西里阿庫斯來說，銘文乃是比手稿文本更具可靠性的實體證言。他曾經以文本來考定古物，根據古人的證詞來辨識古代建築與圖像。這個做法翻轉了佩托拉克式的古物研究觀念：佩托拉克基本上是運用古物來考定文本，而西里阿庫斯則以文本來照亮遺跡。[105]強調文物資料重於文學文本，可說是西里阿庫斯對古物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貢獻。

隨著古典學術的進展，古物學繼續發揚，其歷史價值持續受到重視。到 1560 年代中期，佛羅倫斯人文學界發生一場學術論戰，博基尼（Vincenzio Borghini, 1515-1580）與梅頤（Girolamo Mei, 1519-1594）兩位古典學者辯論「古典文本」與「古代文物」的可信度問題。這一場論戰起於兩人對佛羅倫斯的起源問題的爭議。梅頤提出一種論斷，主張佛羅倫斯原本是座落在亞諾河（Arno）下游的西格納（Signa）地方，但中世紀初遭到毀壞，直到八世紀才由倫巴底人在現址重建。[106]佛羅倫斯在古代並不是一個重要城市，記

---

[103] Patricia Fortini Brown, *Venice and Antiquity: The Venetian Sense of the Pa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83.

[104] Patricia Fortini Brown, *Venice and Antiquity: The Venetian Sense of the Past*, p. 82.

[105] Patricia Fortini Brown, *Venice and Antiquity: The Venetian Sense of the Past*, pp. 84-85.

[106] Ann E. Moyer, "Historians and Antiquarians in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4: 2 (April, 2003), p. 180.

載少而且簡略，後世難以檢證有關其起源問題。梅頤是一個典型的人文學者，奉古代「文本」為權威。他發現羅馬典籍在談塔斯坎尼（Tuscany）地區城市時，大都沒有提到「佛羅倫提亞」（Florentia），遂由此推斷它應不是這個地區的城市。梅頤也注意到西元一世紀普林尼《自然史》（*Natural History*）列舉塔斯坎尼地名時，曾提到「亞諾河的佛魯恩提尼（Fluentini）」一地，而弗羅魯斯（Lucius Annaeus Florus, 西元二世紀）的史著也出現此一地名。不過，他認定「佛魯恩提尼」應是另一個城市，而非佛羅倫斯。[107]

針對梅頤的立論，博基尼先從文本考證的角度逐一反駁。他辯稱普林尼談塔斯坎尼城市時只是例舉，並不是完整臚列，因此未被提及並不表示不存在。他繼而指出普林尼《自然史》第 14 書其實提到「佛羅倫提亞」和「亞瑞提歐」（Aretio）兩地的葡萄種植，顯示塔斯坎尼確實有「佛羅倫提亞」這城市。從考證的角度，他主張普林尼和弗羅魯斯提到的「Fluentini」應即是「Florentia」的訛誤。[108]此外，五世紀初法律或教會文獻也都提到「佛羅倫提亞」這地名，如《狄奧多西法典》（*Theodosian Code*）和米蘭的保利努斯（Paulinus of Milan）的《聖安布羅傳》（*Life of St. Ambrose*）。這些證據都足以顯示五世紀以前佛羅倫斯已是塔斯坎尼的城市。[109]

博基尼知道單憑文本考據並無法解決此一爭議，除非能找到具體的物證作為佐證。博基尼是一個觀察敏銳的古物學者，他發現當代佛羅倫斯城內存在許多古代佛羅倫斯留下的古蹟，可以證明兩者座落在同一個地點。例如：現今佛羅倫斯的街道與房屋配置，可看出古羅馬街道格局和圓形劇場的輪廓，而梅頤認定是古佛羅倫斯原址的西格納地區反而看不到這一類遺跡。[110]不過，梅頤辯稱：這一類遺跡未必即是古代城市建築的基址，而可能僅是

[107] Ann E. Moyer, “Historians and Antiquarians in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 p. 182.
[108] Ann E. Moyer, “Historians and Antiquarians in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 pp. 183-184.
[109] Ann E. Moyer, “Historians and Antiquarians in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 p. 184
[110] Ann E. Moyer, “Historians and Antiquarians in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 pp. 185-186.

古代村落的跡殘，無法證明即是佛羅倫斯的原址；而西格納之所以無古代遺跡，可能只是遭蠻族破壞殆盡。為了說服梅頤，博基尼進一步指出：羅馬人在建立殖民地時，常會把羅馬城市的格局、建築風格、地名等複製到新殖民地。他比較古佛羅倫斯遺跡與同時代其他羅馬殖民地，發現其城市規劃與建築風格相當一致，足以證佛羅倫斯是古羅馬建立的一個殖民地。[111]博基尼用古物學來論證，最終說服了梅頤，確定現代佛羅倫斯與古代佛羅倫斯乃是同一城市的論斷。

博基尼在有關佛羅倫斯起源的辯論中，結合古物和文本的證據，說服信賴文本權威性的梅頤接受他的立場，進一步凸顯出「古物」作為歷史證據的價值。在人文主義歷史書寫的可靠性正面臨挑戰之時，博基尼的論證方式提供歷史學界一種可能的回應途徑。實際上，邇後歷史懷疑論者雖都質疑文學性文本的可靠性，卻大都承認古物的證據價值。例如，哈杜因支持以傳統典籍之外的資料來判定文本的可靠性，據以重建古史。他也提出了一套判定古代文本確實性的原則：錢幣不像文本那麼容易偽造，所提供的證據基本上比較可靠；文本的記載若有錢幣之類文物來印證，即可認定為確實；而其他文本若有經文物證實的文本作背書，亦可認定為可信。相反地，若無錢幣或文物可資印證，則古代文本的可靠性立即受到質疑。[112]哈杜因曾結合文本考訂與古物研究，梳理《舊約》所載史事之正確年序。在《舊約聖經編年》（*Chronologia Veteris Testamenti*, 1697）一書中，他對《聖經》中早期年代的梳理主要是從聖經文本內找證據，而時代愈後則愈多利用錢幣協助定年。他借助希臘與羅馬錢幣，填補了《聖經》中從馬可比（Maccabee）到耶穌降生時期的歷史空白。[113]

波福也是著名的歷史懷疑論者，但並未淪入歷史虛無主義。

---

[111] Ann E. Moyer, “Historians and Antiquarians in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 pp. 186-187.

[112] Daniel J. Watkins, “Skepticism, Criticism, and the Making of the Catholic Enlightenment: Rethinking the Career of Jean Hardouin,” pp. 490-491.

[113] Daniel J. Watkins, “Skepticism, Criticism, and the Making of the Catholic Enlightenment: Rethinking the Career of Jean Hardouin,” p. 492.

他雖質疑羅馬早期歷史書寫的確定性與可靠性，仍主張古代遺留的文物可以協助歷史家重建可靠的古代史。例如，古羅馬與鄰邦的締結的「條約」、大祭司記錄的「年鑑」、元老院的「決議」、監察官的「執掌表」、以及各種雕像和銘文等，都是一手文獻，可資以重建古羅馬的信史。「條約」可憑以斷定日期、確認史實與釐清事實真相。[114]波福舉波利比烏斯《歷史》記載的西元前509年羅馬與迦太基一個條約為例，指出這條約顯示幾個重要史實：迦太基在西元前六世紀初即已開始指染西西里；羅馬與迦太基第一次締約是在西元前 509 年，而非後來史家說的西元前 324 年；布魯圖斯（Lucius Julius Brutus, 西元前六世紀）和霍瑞修斯（Marcus Horatius, 西元前六世紀）同於西元前509年擔任執政；羅馬人此時已經有航海或海盜的行動；西元前六世紀初，羅馬勢力已遠及特拉西納（Terracina）地區，而安提姆（Antium）和阿迪亞（Ardea）兩國是羅馬的屬邦而不是獨立國家。這些事實足以修正李維等後代史家的敘事錯誤。[115]

波福認同原始資料的運用有助於提升歷史書寫的可靠性。除條約外，他指出，「大祭司年鑑」可構成「最完整與最真實的歷史敘述」，因羅馬大祭司登錄事實時，依西塞羅的說法，需要接受公民的公開檢證，難以作偽。[116]「元老院法令或議事錄」記錄元老院的討論與決議，將重要事實確切地如實傳遞下來。若能無間斷保存一系列這類紀錄，「不就可很容易確定所有事實的真實性、斷定其日期？或那不就是一部完整的歷史？」[117]監察官的「執掌表」除記載監察官的職掌與守則，也記錄了羅馬公民數的總調查：「這些可能是最完整的一種文獻，也是史家曾經細心參

[114] Louis de Beaufort, *A Dissertation upon the Uncertainty of the Roman History during the First Five Hundred Years*, p. 30.

[115] Louis de Beaufort, *A Dissertation upon the Uncertainty of the Roman History during the First Five Hundred Years*, pp. 32-36.

[116] Louis de Beaufort, *A Dissertation upon the Uncertainty of the Roman History during the First Five Hundred Years*, pp. 59-60.

[117] Louis de Beaufort, *A Dissertation upon the Uncertainty of the Roman History during the First Five Hundred Years*, pp. 64, 66.

證的資料。」[118]「雕像」與「銘文」等文物保存對偉人的記憶，「即便不足復原歷史的全貌，至少無可置疑地保存重要事實的記憶、確定其發生日期、將偉人之榮耀傳到後世」。[119]可惜的是，除監察官的「執掌表」外，上述公共文獻大都毀於西元前390年的羅馬焚城。

歷史懷疑論挑起的歷史可靠性爭議，意外地讓近代早期史家認知「非文學性資料」（non-literary sources）的潛在史料價值，激勵其逐步利用古代文物來協助重現古代史，甚至中世紀史，促成歐洲歷史觀念與方法的一次重要革新。

（二）古物研究的發展

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初，人文主義學術的探究方向逐漸從以「典籍」為主的文字考訂，轉入以「文物」為主的古物研究。「古物研究」是文藝復興古典學術的一個分支，也是人文主義歷史研究的一種形式。

文藝復興時代，歐洲的歷史學沿著兩個方向發展。一方面是人文主義史學興起，史家循著李維的古典史學傳統，主要根據以「見證」為基礎的「敘事性史源」來書寫歷史，而書寫的主要對象是晚近的歷史，著重政治史與軍事史。另一方面是古物研究的發展，古物學者傳承古典古物學的理念，以古代為探究對象，意圖透過古代文物與制度的系統考究，來復原古代文明的全貌。在近代早期歐洲史學中，人文主義史學乃是歷史書寫的主流，而古物研究雖然成就斐然，其史學價值卻很少被認識，有相當長的時間大都僅是沉默地存在著。然而，從近代歐洲史學的發展考察，古物研究的興起卻意外地成為文藝復興人文主義歷史書寫典範轉移到近代歐洲實證主義史學典範的重要橋樑。

歐洲的古物研究的起源可追溯到古典時代的希臘。西元前五

---

[118] Louis de Beaufort, A *Dissertation upon the Uncertainty of the Roman History during the First Five Hundred Years*, pp. 74-76.

[119] Louis de Beaufort, *A Dissertation upon the Uncertainty of the Roman History during the First Five Hundred Years*, p. 51.

世紀，希臘學者伊利斯的西佗阿斯（Hippias of Elis）探究古希臘英雄人物的譜系、城邦的起源傳說、官員的名稱表、奧林匹亞運動會的優勝名錄等課題，創立了「考古學」（archaiologia）。西佗阿斯的考古學意指探究事物的源始，就史學而言就是研究古代歷史。這乃是在修西底德的史學之外另闢一條不同的歷史研究途徑，可以彌補以書寫當代史為主的修西底德史學的不足。[120]羅馬學者瓦羅（Marcus Terentius Varro, 116-27B.C.）傳承西佗阿斯的考古學理念，進一步發展出「古物學」（antiquitates）。瓦羅的古物學不限於探究個別事物的起源，而是轉向整個古代文明的重建，其特色是根據語言、文學與習慣等的證據，以及銘文、法典之類資料，系統性地考察古羅馬生活的所有層面。[121]西佗阿斯的考古學和瓦羅的古物學有共通處：研究對象都不是當代而是古代；呈現方式都不是編年式的敘事，而是靜態的系統描述；內容不在政治史與軍事史，而轉向古代器物、宗教習慣、軍事組織或政治制度。文藝復興時的古物學基本上繼承了這些遺產。

近代古物研究發展成一門嚴謹的科學，要歸功於文藝復興義大利人文學者畢揚多。畢揚多出生於義大利佛利城（Forli），在教廷擔任文書工作。他是位優秀的人文學者，對古義大利的歷史地理著力尤深。1444 年至 1446 年間，畢揚多對永恆之城進行系統考查，蒐羅古代文本、文獻、考古、錢幣、銘刻與地圖資料，加以科學的篩選、考訂與解釋，深入描述古羅馬文物與地誌，試圖「復原這座古城的自然外貌」。[122]他將成果寫成《羅馬的復原》（*De Roma instaurata*, 1446）一書，確立科學的古物學原理與方法。[123]畢揚多以同樣的方法考察義大利歷史地理與史蹟，花 6 年時

---

[120] 關於Hippias考古學，參見Arnaldo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pp. 3-4; 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 60.

[121] 關於 Varro 的古物學，參見 Arnaldo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pp. 4-5; Elizabeth Rawson, *Intellectual Life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 Ltd., 1985), pp. 235-247.

[122] Jeffrey A. White, Introduction to *Italy Illuminated*, Vol. 1, books 1-4, by Flavio Biondo, ed. and trans. Jeffrey A. Whi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x.

[123] 關於《羅馬的復原》一書在古物學研究上的地位，參見Roberto Weiss, *The Renaissance*

光寫成《描述古代義大利》（*Italia illuminated*, 1453）。1453年至1460年，他又完成了《羅馬的榮光》（*De Roma triumphante*），考訂古羅馬宗教、民政制度、軍事組織、日常生活，以及凱旋式等主題。[124]

畢揚多既是一個人文主義歷史家，也是一個傑出的古物學者。如前所述，他在1439年至1453年間完成《羅馬帝國衰亡史》，書寫西元410年以後的義大利史；大約同一時期，他又陸續完成上述古物學著作，試圖重現西元410年之前羅馬的文物與制度。從書寫方式與內容看，畢揚多嚴格區隔了古物研究與歷史書寫，並各以不同方法來處理。[125]他的歷史書寫運用人文主義史學的方法，主要根據敘事性史源，以序年方式進行直線的敘事，以晚近歷史為主，偏重政治史與軍事史。他的古物研究則以古代世界為對象，收集各種文字的和非文字的資料，主要是古代遺留的實體文物，對古羅馬文明作系統性的全面考察。[126]畢揚多的古物研究呈現兩種不同面向，分別以《羅馬的復原》和《羅馬的榮光》為代表。《羅馬的復原》是對古羅馬地誌的全面重建，詳盡描述羅馬的各種物質遺跡，如城墻、神殿、道路、建築、紀念碑、雕像等；[127]《羅馬的榮光》則主要再現羅馬鼎盛時的制度與生活，描述其宗教習俗、民政治理、軍事組織、日常生活，及象徵羅馬榮耀的凱旋式等。[128]兩部書從不同側面考察古羅馬，從地誌和建築

Discovery of Classical Antiquity, pp. 66-70.

124 關於《羅馬的榮光》的成書與內容架構，參見Frances Meucke, Introduction to *Rome in Triumph*, Vol. 1, books 1-2, by Flavio Biondo, ed. and trans. Frances Meuck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vii- xxvii.

125 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 70.

126 Angelo Mazzocco, "A Reconsideration of Renaissance Antiquarianism in light of Biondo Flavio's 'Ars Antiquaria' with an Unpublished Letter from Paul Oskar Kristeller (1905-1999)," p. 136.

127 Angelo Mazzocco, "A Reconsideration of Renaissance Antiquarianism in light of Biondo Flavio's 'Ars Antiquaria' with an Unpublished Letter from Paul Oskar Kristeller (1905-1999)," pp. 138-139.

128 Angelo Mazzocco, "A Reconsideration of Renaissance Antiquarianism in light of Biondo Flavio's 'Ars Antiquaria' with an Unpublished Letter from Paul Oskar

到制度和生活，對古羅馬文明進行整體的再現。

畢揚多創立近代歐洲科學的古物研究，確立其方法與方向。[129]在他之後，義大利人文學者持續古代文物的發現、整理與考訂工作；他們研究羅馬地誌，調查義大利古蹟，收集古代銘刻、泉幣與各種古文物，成績可觀。[130]到十六世紀，考訂技術更精進，探究課題也更廣泛，古物學者漸歸為四種類型：或考訂與註疏古代文本、或描述古代遺跡、或重建古羅馬的紀年、或探究古羅馬的單一面向。[131]不過，他們大體上仍循畢揚多開創的方向，主要關注於羅馬地誌與制度的探究與重建，但在資料方面則更注意當時新出土的考古材料。[132]

十七世紀之後，古物研究成為歐洲古典學術的主流。當時的古物學者是古物的愛好者與收藏家，多少帶有歷史懷疑論心態，相信實證觀察比哲學教條更可信。他們基本上偏好「實體的文物」，認為客觀存在的具體器物是其出現時代最可靠的代言者。[133]這些古物學者大都富實證精神，擅長細緻的觀察與深度描述。他們中間不少人具醫生與藝術家身份，兩者均擅長「觀察」與「描述」。藝術家一般都是敏銳的觀察家，古物學者常聘畫家或雕刻師協助繪錄古文物的圖像。實際上，不少古物學者本身即是藝術家，如英國學者歐布瑞（John Aubrey, 1726-1697）是業餘的畫家；也有藝術家本身也是古物專家，如低地國畫家魯本斯（Paul Peter Rubens, 1577-1640）即熱衷收集古錢幣和描繪羅馬珍寶。[134]醫生也是優秀的

Kristeller (1905-1999)," p. 139.

[129] 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 71.

[130] 參見 Roberto Weiss, *The Renaissance Discovery of Classical Antiquity*, chapters 7-13, pp. 90-130, 145-202.

[131] Angelo Mazzocco, "A Reconsideration of Renaissance Antiquarianism in light of Biondo Flavio's 'Ars Antiquaria' with an Unpublished Letter from Paul Oskar Kristeller (1905-1999)," pp. 143-144.

[132] Angelo Mazzocco, "A Reconsideration of Renaissance Antiquarianism in light of Biondo Flavio's 'Ars Antiquaria' with an Unpublished Letter from Paul Oskar Kristeller (1905-1999)," pp. 144-150.

[133] 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p. 56-57.

[134] Peter Burke, "Images as Evid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pp. 293-294. 關於

觀察家，其觀察入微的習慣和解讀病徵的訓練，有助於古文物的詮釋，對古物運動的發展有重要意義。[135]法國古物學者帕丁（Charles Patin, 1633-1693）是個醫生，卻以研究古錢幣而聞名；他的好友史鵬也是醫生，興趣在古錢幣與希臘考古。[136]具古物學興趣的醫生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將「科學的直接觀察方法，引進歷史研究中」。[137]

歐洲史上，十七世紀是「科學革命」的世紀，自然哲學（natural philosophy，即「科學」）是學術的主流。在自然哲學的光芒下，古物研究的光彩不免顯得黯淡，甚至蒙受知識界的輕賤。在這氛圍下，古物學者大都寄身大學講壇，但更多是蟄伏在地方的學術圈，默默進行古物的蒐集與考訂。他們也與歐洲各地的同好頻繁互動，透過書信往返，交換古物信息與研究心得，形成一個特殊的學術圈。法國古物學者培瑞斯克（Nicolas-Claude Fabri sieur de Peiresc, 1580-1637）是箇中典型。培瑞斯克是普羅旺斯（Provence）人，因家族繼承關係，擔任艾克斯（Aix）高等發院法官，是一個典型的鄉紳型學者。培瑞斯克的興趣廣泛，喜好古物，對科學也有興趣，樂衷蒐集古物與珍奇，從錢幣與紀念章、圖書、植物與礦物標本，到科學儀器等，不一而足。不過，他的主要收藏是古文物，特別是古錢幣、雕像與手稿等，總數多達一萬七千件。[138]培瑞斯克沒有發表過正式的古物論著，但他與歐洲各地學者往來的信函中留下許多對當世歐洲古物學的動向與成就的觀察。[139]

1660 年代，法國王室資助下成立的「皇家銘刻與藝文學院」（Académie royal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則是近代歐

英國古物學者歐布瑞的藝術專長，參見 Michael Hunter, *John Aubrey and the Realm of Learning* (New York: 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 1975), pp. 14, 38-39.

135 Peter Burke, “Images as Evid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pp. 294-295.

136 Peter Burke, “Images as Evid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p. 294.

137 Arnaldo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p. 15.

138 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p. 54-55.

139 有關培瑞斯克的生平、交游與學術，參見Peter N. Miller, *Peiresc's Europe: Learning and Virtu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洲重要的古物研究機構。1663 年，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 1643-1715 在位）的財政大臣柯爾貝（Jean-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在「法蘭西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下設置「皇家銘刻與紋章學院」（Académie royale des Inscripti ons et Médailles），延攬古典學者為委員，替王室頒行的紋章或紀念物蒐求、審核適當的拉丁格言與銘文，以表彰國王的偉績。皇家銘刻與紋章學院逐步擴大規模，發展出考古、泉幣、金石與語言部門，於 1701 年從法蘭西學院獨立出來，並在 1716 年更名「皇家銘刻與藝文學院」，同時決定出版《皇家銘刻與藝文學院集刊》（*Mémoi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刊登歷史、考古、語言學、泉幣學、金石學等學術訊息與論文，成為近代歐洲古物學的重要刊物。[140]

皇家銘刻與藝文學院是十八世紀歐洲古典研究的重鎮，當世法國著名的古典學者大都是其成員。[141]《皇家銘刻與藝文學院集刊》刊載的論著則是認識古代歷史與文化的寶庫，曾是青年吉朋案邊最常翻閱的讀物。這位英格蘭歷史家在回憶錄中，生動描述自己 1759 年從瑞士結束留學返回英格蘭後，在拿到第一筆生活津貼時，迫不及待到書店買下這套期刊的喜悅心情：「我收到第一季生活津貼後，立即將大部分用在文學需求上。我難以忘懷，當我拿一張二十英鎊鈔票去交換那二十卷銘刻學院集刊時心中那種快樂。同一筆錢花在其他事物，也買不到這麼豐富的理性娛樂。」[142]他後來寫《羅馬帝國衰亡史》時，《皇家銘刻與藝文學

---

[140] 參見楊肅献，〈吉朋的史學與近代歐洲的古典學術〉，《臺大歷史學報》，51（臺北，2013.6），頁139-140。

[141] 這些學者包括：古文書學大師馬比揚（Jean Mabillon）、古文字學大師孟福貢（Bernard de Montfaucon）、古物學者福列瑞（Nicolas Fréret）、比較史學先驅布羅塞斯（Charles de Brosses）、歷史地理學者丹維爾（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古藝術專家凱勒斯（Comte de Caylus）、近東銘文專家巴特勒密（Jean-Jacques Barthélemy）、印度學家杜泊榮（Anquetil-Duperron）等，都是廣義的「古物學者」。

[142]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of Edward Gibbon-As Originally Edited by Lord Sheffie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7), p. 93.

院集刊》是引證最多的書刊之一。

（三）古物研究與歐洲史學的新動向

古物研究運動提供重要的方法與觀念，促成近代史學方法的革新。[143]十七世紀初，英國哲學家培根將「古物」定義為一種「遭受磨損的歷史，或無意間逃過時光磨難的歷史殘留」，是「從紀念碑、地名、歌辭、俗諺、傳說、私人紀錄和證詞、斷簡殘篇等，保存或救回的一些資料」。在培根眼中，古代遺跡是一種「不完整的歷史」（unperfect history）。[144]過去，人文主義史學主要是依賴「敘事性史源」來撰寫歷史，但是這類資料易受敘事者主觀的影響而失真，也因容易偽造而失實，其可靠性深受歷史懷疑論者的質疑，並不被看做可靠的歷史資料來源。相對地，古代文物乃是古人遺留的具體實物，儘管可能零碎、不完整，卻有如古代歷史的一手「見證」，特別凸顯出作為客觀史料的價值。

古代留下的紀念建築，如凱旋門和紀功柱，其上浮雕的圖像或銘文，保存許多古代歷史的「證據」，若善加利用，可以燭照一些文本資料遺漏的訊息。以「圖拉真紀功柱」（Trajan’s Column）為例。西元 113 年，羅馬皇帝圖拉真（Trajan, 53-117, 98-117 在位）為表彰其征服達西亞（Dacia）之勳業，在羅馬廣場（Roman Forum）樹立紀功柱。紀功柱表面以螺旋的畫面，連環刻畫達西亞戰爭的過程，雕工精美，栩栩如生。文藝復興以來，藝術家和古物家都注意到紀功柱上人物、動物、器械等刻畫的精確，引證其討論古史問題。1576 年，西班牙學者夏孔（Alfonso Chacon, 1530-1599）據之探討羅馬鎧甲、兵器和軍紀；1599 年，荷蘭學者里普西烏斯（Justus Lipsius, 1547-1606）據之描述羅馬的器械和戰爭；1683 年，義大利學者法布瑞悌（Raffaello Fabretti, 1618-1700）也據之討論羅馬戰爭與宗教課題。[145]

1644 年，英國學者伊夫林（John Evelyn, 1620-1706）曾造訪羅馬

---

143 Arnaldo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pp. 10-11.

144 Francis Bacon,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p. 73.

145 Peter Burke, “Images as Evidenc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p. 280.

城，在羅馬廣場看到雄偉的「提圖斯凱旋門」（Arch of Titus），被其上的浮雕所吸引。這座凱旋門是一世紀時皇帝圖密善（Titus Flavius Domitianus, 51-96, 81-96在位）所建，紀念西元70年前任皇帝提圖斯（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 41-87, 79-81在位）平服猶太人的反叛，摧毀猶太聖殿（Temple）的功績。凱旋門的浮雕描繪提圖斯征服猶太人、毀殿的過程。伊夫林注意到其再現歷史的價值：

> 此一無可懷疑的古物和紀念章，呈現給我們那曾光耀一時的聖殿，其境遇淒慘可悲的反轉；以及那頑冥民族因害死上帝之子之大不敬與歹意而招致的毀滅。從這些古物，我獲得的教誨遠比所有約瑟法斯和那時以來其他史家史書記載者要多。[146]

在近代古物研究中，錢幣和銘刻是重要的探索領域，對歷史學的發展最有貢獻。[147]十六世紀以來，陸續有學者為古錢幣作為史料的價值辯護，主張這類文物有助於重建可信的羅馬史。1559年，威尼斯學者伊瑞佐（Sebastiano Erizzo, 1530-1585）討論古代錢幣時指出：羅馬帝國遺留的錢幣保存不少文字史料遺漏的史實，「揭露了這些皇帝的全部歷史」。[148]伊瑞佐是威尼斯錢幣研究的先驅，創立一套古錢幣研究方法。西班牙塔拉戈納（Tarragona）大主教奧古斯亭（Antonio Agustin, 1517-1586）也是古物學者，其 1587 年的《古錢幣對話錄》開創了西班牙的錢幣研究。在書中，他宣稱自己「對錢幣、碑表、大理石等，比對任何以文字書寫的文件更

---

146 John Evelyn, *Numismata: A Discourse of Medals, Ancient and Modern. Together with some Account of Heads and Effigies of Illustrious and Famous Persons, in Sculps, and Taille-Douce, of Whom we have no Medals extent; Of the Use to be derived from them: To which is added A Digression concerning Physiognomy* (London: Benjamin Tooke, 1697), p. 72.

147 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 58.

148 Sebastiano Erizzo, *Discorso sopra le Medaglie de gli antichi, con la dichiarazione delle Monete Consolari, e deJle Medaglie degl' Imperatori* (原載於 Venice, 1559). 本處轉引自 Peter Burke, “Images as Evidenc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p. 276.

具信心」，[149]強調找不到比羅馬錢幣更可靠的史料，因為這類文物乃是羅馬政府親自背書的官方文件。[150]

瑞士日內瓦大學教授史班漢（Ezekiel Freiherr von Spanheim, 1629-1710）是十七世紀後期古錢幣大師，在1664年出版《論古錢幣之用處》，是近代早期錢幣學的巨著。[151]史班漢重視古錢幣作為歷史證據的價值：錢幣保存的狀況要比手稿好、比文本少帶有偏見，又以圖像來彌補歷史紀錄的空白。法國的史鵬是位醫生與考古家，早先研究法國里昂地區的古文物，出版專著《里昂地區古物與珍奇研究》（*Recherche des antiquités et curiosités de la ville de Lyon*, 1673），也曾親往希臘探索古文物。史鵬將古文物比作是一本以大理石雕和銅器完成的書，有助於解決羅馬文本資料之間的矛盾之處。[152]

在十七、十八世紀之際，英格蘭文人圈曾熱烈討論「紋章」（medals）之學術價值，作家伊夫林和評論家艾狄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都參與討論。1697年，伊夫林在《古紋章學：論古今錢幣》中暢論古錢幣的價值。近代學者珍愛與蒐求紋章，他指出，乃是因其背面雋留有圖像與銘文，描繪古人的作為，裡面「滿盡是學問」，保存豐富的歷史訊息。[153]他細數紋章中蘊藏的歷史資料：執政、國王、皇帝等人物的習慣、衣袍；顯赫家族的名姓氏、頭銜、爵位與家徽；各種馬車、兵器、軍械、盾牌、臂章樣式；古代戰艦、船隻造型、海戰方式、艦長事蹟；軍事征伐、軍團、軍紀、戰和、凱旋等紀錄；宏偉建築之外觀，如金字

---

149 原文轉見Arnaldo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Antiquarian,” p. 16; 英譯文轉見Peter Burke, “Images as Evidenc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p. 276.

150 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 57.

151 Ezekiel von Spanheim, *Disputationes de usu et præstantia numismatum antiquorum* (Rome, 1664; in 2 vols., London and Amsterdam, 1706-1717).

152 Peter Burke, “Images as Evidenc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pp. 276-277.

153 John Evelyn, *Numismata: A Discourse of Medals, Ancient and Modern. Together with some Account of Heads and Effigies of Illustrious and Famous Persons, in Sculps, and Taille-Douce, of Whom we have no Medals extent; Of the Use to be derived from them: To which is added A Digression concerning Physiognomyy*, p. 48.

塔、神殿、方尖碑、宮殿、祭壇、劇場、廣場、凱旋門、橋樑、水道橋等。[154]古錢幣的背面保存了無數早已毀壞、淹滅或改變的事物：古代重要建築的造型與裝飾；古代事物與地方的原名；古代城市的固有自由與特權；歷史人物、事件發生的正確年代；甚至拉丁文的字源、語彙與文法的本源等。[155]

伊夫林相信，若能完整、無中斷地收集整個系列的希臘與羅馬錢幣，將對文人界帶來巨大貢獻。「如果得到一個如此的寶藏，將可提供學術界大量、豐富的稀世古物」。這些稀世古物可作為「好的歷史，以及已經被遺忘的事物的輔助證物」。這一種證物「遠比其他任何會朽壞的紀錄更屬確定可靠，因錢幣不必由書籍和作者來檢證，反而是書籍和作者可由錢幣來檢證」。他引用十六世紀古典學者史卡利格（Joseph Justus Scaliger, 1540-1609）的一段話：

> 我忍不住要讚嘆，在錢幣和銘文中，多少高貴的紀錄、稀有與難解的秘密保存在裡頭，並繼續傳遞下來給我們。……我們永遠不可能有比這些更為清晰、明白的證詞了！[156]

任何人想了解錢幣如何印證與支持古代史，伊夫林建議他去閱讀低地國古典學者史班漢的專著。總之，伊夫林相信：「假如能擁有一個完整、不間斷系列的古代錢幣，我幾乎可以不再需要其他

---

154 John Evelyn, *Numismata: A Discourse of Medals, Ancient and Modern. Together with some Account of Heads and Effigies of Illustrious and Famous Persons, in Sculps, and Taille-Douce, of Whom we have no Medals extent; Of the Use to be derived from them: To which is added A Digression concerning Physiognomyy*, pp. 48-49.

155 John Evelyn, *Numismata: A Discourse of Medals, Ancient and Modern. Together with some Account of Heads and Effigies of Illustrious and Famous Persons, in Sculps, and Taille-Douce, of Whom we have no Medals extent; Of the Use to be derived from them: To which is added A Digression concerning Physiognomyy*, pp. 49-53.

156 John Evelyn, *Numismata: A Discourse of Medals, Ancient and Modern. Together with some Account of Heads and Effigies of Illustrious and Famous Persons, in Sculps, and Taille-Douce, of Whom we have no Medals extent; Of the Use to be derived from them: To which is added A Digression concerning Physiognomyy*, pp. 70-71.

的歷史書。」[157]

艾狄生則以對話體寫了《論古錢幣的用處》（*Dialogues upon the Usefulness of Ancient Medals*, 1721）。書中第一個對話討論古紋章的價值：在古物學者眼中，一櫃的古錢幣呈現的「並不是一櫃的財富，而是一櫃的知識」；吸引古物學者的「不是閃亮的金子，而是錢幣上裝飾的人物與銘文」。[158]在古錢幣與紀念章上，可看到史上著名人物的肖像，也可遇到名不見經傳的人物，他們僅在古錢幣留下肖像。例如：「有些皇帝曾有妻子和子女，但沒有任何作者提及。因此，我們必要去探究錢幣，為學者作出新發現，提供他們在其他紀錄中看不到的人物信息。」[159]人物之外，紋章上也可看到所有古物庫中看得到的器物、錢幣上描繪有種種古代的風俗習尚，如祭典、凱旋式、訓諭等，錢幣的銘文可以發現一些拉丁文的正確拼法。「要不是古錢幣保存下這些事物，我們不可能有這麼正確的概念」。[160]

艾狄生總結錢幣或紋章對歷史研究的用處：「確實，錢幣可以大幅地照亮歷史，包括：印證古代作者的某些文句是否正確，斷定一個故事不同說法的爭議，記錄下遭到忽略的事物。就此，一櫃紋章（錢幣）就是一部歷史。」錢幣乃是使偉大作為的記憶永存的最佳方式，將皇帝的一生鑄在錢幣上，並將每件偉大事蹟送入鑄幣廠，「可說是印刷術發明之前的印刷術」。[161]艾狄生帶

---

[157] John Evelyn, *Numismata: A Discourse of Medals, Ancient and Modern. Together with some Account of Heads and Effigies of Illustrious and Famous Persons, in Sculps, and Taille-Douce, of Whom we have no Medals extent; Of the Use to be derived from them: To which is added A Digression concerning Physiognomyy*, p. 48.

[158] Joseph Addison, "Dialogues upon the usefulness of Ancient Medals.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the Latin and Greek Poets," in *The Works of Joseph Addison. With notes by Richard Hurd, D.D.*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906), vol. 1, pp. 257-258.

[159] Joseph Addison, "Dialogues upon the usefulness of Ancient Medals.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the Latin and Greek Poets," p. 259.

[160] Joseph Addison, "Dialogues upon the usefulness of Ancient Medals.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the Latin and Greek Poets," p. 262.

[161] Joseph Addison, "Dialogues upon the usefulness of Ancient Medals.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the Latin and Greek Poets," p. 263.

著歷史懷疑論的態度，宣稱「古物」乃是比「文字資料」更可靠的史料。史家書寫歷史時，艾狄生說，徵引一枚錢幣遠比引用一個作者更屬可靠，因為如此史家「不是訴諸一個蘇東尼烏斯或一個藍普瑞狄烏斯（Aelius Lampridius，按：《羅馬皇帝傳》〔*Augustan History*〕作者之一），而是直接訴諸皇帝本人或整個羅馬元老院。」他強調文字史料容易遭到篡改、甚或偽造，但「錢幣上的文字則無遭抄寫者或抄錄者更動之虞」。[162]

五、結論：近代歐洲史學的古典學術背景

義大利史家莫米格利亞諾點出，近代史學方法一個重要特色，在於歷史家注意區分「原始資料」與「二手資料」，並主要以原始資料作為「證據」來重建歷史的真實。[163]美國史家吉爾伯特呼應此一觀點，認為近代史學重視以科學考訂方法來確定史實，並強調在歷史重建上「文獻性史料」（documentary sources）優於「敘述性資料」（narrative account）。[164]這種史學觀念的轉變，革新了史家的治史觀念和方法，是歷史寫作對象能從晚近的歷史延伸到古代歷史的重要關鍵。

文藝復興以來古物研究的發展對近代早期歐洲史學方法的革新有重要貢獻。十七世紀時，歐洲的古物學已經發展到複雜的層次。古物學者以科學的精神進行兩方面的工作：其一，廣泛蒐集、整理、解讀具體的古物，如銘刻、泉幣、雕像、特許狀、遺跡、考古證據等，從中萃取個別的古史事實。其二，根據蒐集到的事實來考證地誌、制度、習尚、宗教等古史專題。[165]對個別課題進行深度系統性描述的工作，可說是現代史學中「專題」、「專史」或「專論」研究的濫觴。

---

[162] Joseph Addison, “Dialogues upon the usefulness of Ancient Medals.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the Latin and Greek Poets,” p. 263.

[163] Arnaldo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p. 2.

[164] Felix Gilbert,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 Century Florence*, p. 219.

[165] 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p. 58-59.

談到近代史學的起源，一般會聯想到十九世紀德國的「史學運動」，認為這個由史家蘭克領導的史學革命，帶動史學觀念與方法的革新，開啟現代歷史研究與書寫的新途徑。英國史家巴特費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考察十九世紀德國的史學運動，指出有兩項發展影響近代歷史研究的方向：「檔案」開放與「考證學」確立。一方面，1860 年代後歐洲各國陸續開放政府檔案，使得以一手資料來研究、撰寫近、現代史成為可能，翻轉了近代早期人文主義史學以口傳資料來撰寫歷史的慣例；另一方面，古典學者尼布爾（Barthod Georg Niebuhr, 1776-1831）確立考證學（criticism 或 philology），運用科學的考證方法來考訂古代史料，確定史實的真確性，使歷史家重建古代的信史成為可能。[166]

巴特費爾德對現代史學起源的考察自屬精闢，其論斷基本上可以認同，但須要部分的修正。檔案的開放及其應用到歷史研究確實是十九世紀史學革命的重要貢獻。公共檔案開放以後，近代歷史的研究與書寫有「原始資料」做基礎，不必再依賴「敘事性史源」，翻轉了古典時代以來歐洲史家治史的舊習慣，堪稱歐洲史學的一大革命。然而，考證學並非十九世紀德國古典學者的創新，而是文藝復興時代以來人文學者長期開拓、耕耘的結果。實際上，尼布爾並不是第一個革新古史研究方法者，也不是第一位運用古典研究成果來重建古代史的史家。[167]在這方面，十八世紀英格蘭歷史家吉朋應該是重要的先驅者。

在歐洲學術史上，考證學的發展有一段長遠的歷史。就淵源論，考證學乃是十五世紀人文學者瓦拉（Lorenzo Valla, 1407-1457）建立的治學方法。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人文學者的主要工作是運用考證方法來考訂古代文本，兼及古物的考究。十六世紀之後，文藝復興運動北傳，法國成為人文運動的中心，古物學漸成為古

---

[166] Herbert Butterfield, *Man on His P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 75-85.

[167] 尼布爾曾撰寫了一部《羅馬史》（Romische Geschichte），出版於 1812 年，並在 1827 年至 1828 年改寫再版。這部史著印證了以科學的考證方法重新改寫古代歷史的可能性。

典學術的主流，吸引眾多古典學者投入。到十八世紀中期，考證學重心才轉移到德意志地區，尼布爾是其核心人物。在尼布爾之前，從十六到十八世紀，歐洲的古典學界汲汲於發掘、考訂古典文本，蒐集、整理古代文物，時間長達近三百年，在這期間累積了豐富的古代歷史資料，以待有識見的學者用來重建古代文明的面貌。

近代早期歐洲古典考證學的發展，發掘許多種類的古代歷史資料，其中包括大量古物史料。這批古物史料是古人遺留的具體物證，可用來協助重建古代歷史真相，但長期以來卻未得到傳統史家的注意。它們乃是近代古物學者在傳統史著之外發掘到的古代歷史的新證據，靜待有慧見的歷史家的認識和運用。這類新型史料可說是古代歷史的一種物質見證，經過古典學者的嚴密考訂，具有高度的可信度。有了這類可靠的證據，歷史家遂有可能突破「當代史」的侷限，去書寫「古代的」「真實歷史」。

這是近代史學方法的一個重要突破，為歷史書寫帶來新契機。史家莫米格利亞諾評論說：「有了具永恆價值之關於紋章、古文書、銘文與圖像的論著，十八世紀古物學者遂可懷著前輩所無的信心，大膽涉入舊的或新的領域。他可以使自己變成歷史家，或者可以協助歷史家書寫一種新型的歷史。」[168]吉朋是近代史家中少數看出古物研究之史學價值者，並巧妙運用這類新型證據來重建古代史，遂能寫出原創性的經典史著《羅馬帝國衰亡史》。

自修西底德以來，歐洲歷史的研究與寫作出現分流現象。正統史家秉持「口傳」證據原則，維持「當代史」的寫作傳統，而對「古代史」寫作缺乏信心。不過，近代早期的古典學者並沒有放棄古代史探索，只是在古代史的研究方面另闢蹊徑，投入「古物研究」的領域，致力發掘、蒐集和考訂古代文物，包含錢幣、銘文、雕像、建築，以及各種文獻。這些文物都是古代殘留下來的原始資料，裡頭蘊藏著豐富的古代歷史訊息，成為賴以重建古

[168] Arnaldo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p. 18.

代歷史的可靠證據。這些古代證據的發掘與呈現，無意中為一種新的歷史方法鋪路，使歷史家開始有信心去書寫原本認為不可能或不必要的「可信的古代史」。

（責任編輯：王亭方　校對：黃品欣）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希羅多德（Herodotus）著，王以鑄譯，《歷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修西底德（Thucydides）著，謝德風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著，王曉朝譯，《西塞羅全集（卷一）：修辭學》，臺北：左岸出版社，2005。

Addison, Joseph. *The Works of Joseph Addison. With notes by Richard Hurd, D. D.*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906.

Agrippa, Heinrich Cornelius. *The Van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London: Printed by J. C. Samuel Speed, 1676.

Bacon, Francis.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London: J. M. Dent & Sons, 1962.

Beaufort, Louis de. *A Dissertation upon the Uncertainty of the Roman History during the First Five Hundred Years*. In Two Parts.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London: T. Walter, 1740.

Biondo, Flavio. *Italy Illuminated*, vol. 1, books 1-4,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effrey A. White.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effrey A. Whi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Biondo, Flavio. *Rome in Triumph*, vol. 1, books 1-2,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Frances Meucke.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Frances Meuck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Cicero, Marcus Tullius. *De re publica & De legibus*. Translaed by C. W. Key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Ed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Descartes, René. *Discourse on Method.* Everyman's Library Edition. London: J. H. Dent & Sons, Ltd.;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12, 1927.

Empiricus, Sextus. *Outlines of Pyrrhonism*. Translated by R. G. Bur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E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Evelyn, John. *Numismata: A Discourse of Medals, Ancient and Modern. Together with some Account of Heads and Effigies of Illustrious and Famous Persons, in Sculps, and Taille-Douce, of Whom we have no Medals extent; Of the Use to be derived from them: To which is added A Digression concerning Physiognomy*. London: Benjamin Tooke, 1697.

Gibbon, Edward. *Autobiography of Edward Gibbon-As Originally Edited by Lord Sheffie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7.

Hardouin, Jean. *The Prolegomena of Jean Hardouin*. Translated by E. Johnson. Sydney: Angus & Robertson. Ltd., 1909.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Translated with notes by George Rawlinson. Ware: Wordsworth Editions Ltd., 1996.

Spanheim, Ezekiel von. *Disputationes de usu et præstantia numismatum antiquorum*. Rome, 1664; in 2 vols., London and Amsterdam, 1706-1717.

Spon, Jacques. *Miscellanea eruditae antiquitatis*. Lyon: Sumptibus Fratrum Huguetan & Soc., 1685.

Spon, Jacques. *Recherches curieuses d'antiquité*. Lyon: Amaulry, 1683.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 I. Finley. Translated by Rex Warner. New York: Penguin Group, 1972.

二、近人專書

傅偉勳，《西洋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1987。

Bouwsma, William J. *Venice and the Defense of Republican Liberty: Renaissance Values in the Age of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Brown, Patricia Fortini. *Venice and Antiquity: The Venetian Sense of the Pa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Bury, J. B. *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 London: Macmillan & C., 1909.

Butterfield, Herbert. *Man on His P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

Edbury, Peter W. and John Gordon Rowe. *William of Tyre: Historian of the*

Latin E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Franklin, Julian H. *Jean Bodin and the Sixteenth-Century Revolution in the Methodology of Law and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Furet, Francois.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Gilbert, Felix.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 Century Florenc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4.

Green, Louis. *Chronicle into History: An Essay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in Florentine Fourteenth-Century Chronic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Hay, Denys. *Annals and Historians: Western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Eigh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77.

Hess, Alexander. *Johann Sleidan and the Protestant Vision of History*.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8.

Hunter, Michael. *John Aubrey and the Realm of Learning*. New York: 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 1975.

Kelley, Donald R. *Faces of History: Historical Inquiry from Herodotus to Herd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Miller, Peter N. *Peiresc's Europe: Learning and Virtu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Momigliano, Arnald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Nauret, Charles G. Jr. *Humanism and the Culture of Renaissance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Ozement, Steven. *The Age of Reform, 1250-1550: An Intellectu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Late Medieval and Reformation Europ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opkin, Richard H. *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From Savonarola to Bayle.*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ullapilly, C. K. *Caesar Baronius: Counter-Reformation Historian*.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5.

Rawson, Elizabeth. *Intellectual Life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 Ltd., 1985.

Ridley, Ronald T. *Gibbon's Complement: Louis de Beaufort*. Venezia: Istituto Veneto di Scienze, Lettere ed Arti, 1986.

Sandys, John E.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 1964.

Skinner, Quentin. *Machiavell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Usher, Stephen. *The Historians of Greece and Rome*. New York: Taplinger Publishing Co., 1970.

Walsh, P. G. *Livy: His Historical Aims and Metho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Weiss, Roberto. *The Renaissance Discovery of Classical Antiquity*. 2nd edi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Wilcox, Donald J. *The Development of Florentine Humanist Historiograph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三、近人論文

楊肅献，〈吉朋的史學與近代歐洲的古典學術〉，《臺大歷史學報》，51，臺北，2013.6，頁 119-180。

楊肅献，〈從人文主義史學到哲學的歷史：吉朋歷史書寫的近世歐洲史學脈絡〉，《臺大歷史學報》，62，臺北，2018.12，頁 139-212。

Black, Robert. “Benedetto Accolti and the Beginnings of Humanist Historiography.”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96: 378 (January, 1981), pp. 36-58.

Burke, Peter. “A Survey of the Popularity of Ancient Historians, 1450-1700.” *History and Theory*, 5: 2 (1966), pp. 135-152.

Burke, Peter. “Two Crises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33 (1998), pp. 3-16.

Burke, Peter. “Images as Evid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4: 2 (April, 2003), pp. 273-296.

Evans, J. A. S. "Father of History or Father of Lies: The Reputation of Herodotus." *The Classical Journal*, 64: 1 (October, 1968), pp. 11-17.

Grafton, Anthony. "Jean Hardouin: The Antiquary as Pariah."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62 (1999), pp. 241-267.

Hay, Denys. "Flavio Biondo and the Middle Ages." In *Renaissance Essays*, pp. 35-66. London: The Hambledon Press, 1988.

Matytsin, Anton. "Historical Pyrrhonism and Historical Certainty in the Early Enlightenment." In *Pour et contre le scepitcisme: Théories et Pratiques de l'Antiquité aux Lumières*, edited by Elodie Argaud, Nawalle El Yadari, Sébastien Charles, and Gianni Paganini, pp. 243-259.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15.

Mazzocco, Angelo. "A Reconsideration of Renaissance Antiquarianism in light of Biondo Flavio's 'Ars Antiquaria' with an Unpublished Letter from Paul Oskar Kristeller (1905-1999)."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vol. 59/60 (2014/2015), pp. 121-159.

Momigliano, Arnald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13: 3/4 (1950), pp. 285-315.後收入 Arnaldo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In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pp. 40-55.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Momigliano, Arnaldo. "Gibbon'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Method." In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pp. 1-39.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Momigliano, Arnaldo. "Historiography on Written Tradition and Historiography on Oral Tradition." In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pp. 211-220.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Moyer, Ann E. "Historians and Antiquarians in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4: 2 (April, 2003), pp. 177-193.

Spini, Giorgio. "Historiography: The Art of History in the Italian Counter Reformation." In *The Late Italian Renaissance 1525-1630*, edited by Eric Cochrane, pp. 91-133.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970.

Watkins, Daniel J. “Skepticism, Criticism, and the Making of the Catholic Enlightenment: Rethinking the Career of Jean Hardouin.” *Journal of Jesuit Studies,* 6: 3 (August, 2019), pp. 486-504.

Historical Pyrrhonism, Antiquarianism and the Origin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Yang, Su-hsie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investigate the scholarly foundations of writing "truthful" ancient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with a view to tracing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historical method. Renaissance humanists revived the paradigm of the historical writing developed by classical historians, which relied on narrative sources as evidence. But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pyrrhonism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 which questioned the reliability of narrative sources, shook the foundations of the humanist historical writings. The rise of antiquarian research, however, helped the humanist historians out of this crisis. Antiquarianism was a branch of Renaissance classical scholarship which attempted to reconstruct the ancient world via material remains such as coins, inscriptions, pictures, monuments, and documents. These tangible objects, being directly left by the ancients, were assumed to be more reliable than narrative sourc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 and could therefore be used to reconstruct trustworthy ancient history. The rise of antiquarianism was to cause a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methods, which induced historians to shift to primary sources for historical evidence. In so doing, early modern European antiquarians not only helped to lay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which cherishes mainly primary sources; they also enabled modern historians to write ancient as well as contemporary history.

Keywords: classical historiography, humanist historiography, historical pyrrhonism, antiquarianism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